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古代诗文总集选介

张 涤 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古代诗文集选介

张 涤 华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2242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32242

2006/2/10

關注獵古資源微信公眾平臺
獲取最新書籍資源上傳信息



公眾平臺賬號: lieguziyuan
網址: www.lieguziyuan.com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古代诗文总集选介

张涤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79,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00

统一书号: 10186·557

定价: 0.47元

玉台新詠卷第一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古詩八首

陳思王詩集卷第一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古樂府詩六首

二、明崇禎六年趙均刻本《玉台新詠》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九十一

詩三百四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九十一

詩三百四十一

行遠三

張九齡十一首

張九齡二首

王維四首

孫逖六首

賀知章一首

孟浩然十一首

杜甫十首

李白五首

張幹一首

蔡希寂一首

蔡母潛一首

初發道中寄遠

張九齡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開胡馬思今聽楚猿啼念別

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守自是常恐無如絲

自懷苦寄遠江上作

前人

歸去江南水底清轉蓬空闊更聊涉滌情浦樹

三、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

文粹卷第六

古賦已

卷十

吳興

銘

纂

名山

華山賦

楊時之

霍山賦

皮日休

名山

牡丹賦

郭元振

長樂花賦

蘇頌

名山

桃花賦

皮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名山

荔枝賦

張九齡

嵩山賦

李德裕

名山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紀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時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之大者為
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
根渾渾河漢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峻荆巫環嶽道之云遠
勢位逼而實微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與之千仞不
為榮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雲霓之相差紅靄出其中來飲河涸
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此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
頂肅阿草草蟠五百里當諸侯田畝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

四、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文粹》

目 次

导 言	1
一、《文选》	20
二、《玉台新咏》	29
三、《文苑英华》	35
四、《唐文粹》	40
五、《古文苑》	49
六、《古文观止》	53
七、《全唐诗》	60
八、《唐诗三百首》	76
九、《古文辞类纂》	85
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104
十一、《骈体文钞》	113
附 录	119

獵古資源

导 言

(一)

“总集”的名称出现于六朝，是梁阮孝绪定的。孝绪《七录·序目》，“文集录第三曰总集部，十六种，第四曰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两部并计二百八十九种。”①《隋书·经籍志》把两部合为总集一类。自此以后，唐、宋、元、明诸史的《经籍志》或《艺文志》相继采用，于是总集一名就通行了。

刘师培《论文杂记》说：“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汉志》载颂、赋、诗一百家，皆不曰集。晋荀勗分书为四部，四曰丁部，不曰集也。宋王俭作《七志》，三曰文翰，亦不曰集也。文集之称，始于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以为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创，则文集至东汉始有矣。）”又说：“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至于东汉，文人撰作，以篇计，不以集名（观《后汉》各列传可见。后世所谓《张平子集》、《蔡中郎集》者，皆后人追称之词也。）六朝以

①阮孝绪（公元479—536年），南朝梁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士宗，隐居不仕。他的《七录》十二卷，《隋志》著录，是目录学的重要著作，惜早亡佚，其序文见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

降，集名始兴，分总集、专集为二类。”^①刘氏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最后几句容易使人误会总集与专集（“专集”也称“别集”）同时并起，其实总集是在别集大量涌现之后才有的，没有别集就不会有总集。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上》：“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牒，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疵，览无遗功，可谓学矣。”^②这是说文集多了，阅者全读或选看都有困难，于是就需要编录总集。《隋书·经籍志·序》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总集之所以应运而兴的原因，但以为总集始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却是不正确的。

考《隋书·经籍志》著录《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均题挚虞撰。虞（公元？—311年），字仲治（按：治，《晋书》作“洽”），长安人，皇甫

①《刘申叔先生遗书》本。按《四库提要》集部别集类小序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所说不如刘氏的详确。

②《隋志》著录《金楼子》十卷，今本只六卷。《立言篇》见卷四。

谧弟子。晋武帝泰始中举贤良，累官至光禄太常卿。怀帝永嘉五年（公元 311 年），洛阳大饥荒，饿死。传见《晋书》卷五十一。他的《文章流别集》，《晋书》作三十卷，阮孝绪《七录》作六十卷，与《隋书·经籍志》不同。但书已早佚，只有《艺文类聚》等类书尚保存了若干条^①。《文章流别集》之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杜预《善文》五十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四十九卷），也列于总集类内。杜预（公元 222—284 年），字元凯，是晋初的名将，又是学者，年辈与皇甫谧略相当，早于挚虞。他的《善文》问世也在《文章流别集》之前。《史记·李斯传》裴骃《集解》引用一个隐姓名的辩士《遗秦将章邯书》，并说：“此书在《善文》中。”可见《善文》就是好文章的汇编，挚虞的《流别》可能即仿杜书而作，只可惜《善文》也早亡佚了^②。

东汉末，曹丕有《与吴质书》，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幹）、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③姚振宗《三国艺文志》集部总集类著录魏文帝《建安七子集》，即据《与吴质书》。书中所说的“昔年”，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这年发生了一次大瘟疫。据

①严可均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辑得十二条，见《全晋文》卷七十七。②《善文》，北宋王尧臣等编的《崇文总目》即未著录，大约亡佚于唐末五代。

③《文选》卷四十二。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曹丕此书作于建安二十三年，即在大疫的后一年。编录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的遗文为一集，也即在这一年。再过八年，曹丕就死了。这时，杜预还只四岁，所以七子遗文集实早于《善文》几十年。就现在所知，总集没有比这更古的了。

但有人认为总集的起源可以往上推。如刘师培说：

《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皆无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旧作，汇为一编，犹近世坊间所行之撰赋也。共二百三十三篇。）而班《志》于区分之意，不注一词。近代校讎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①。

刘氏所说“近世校讎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这话不大准确，因为章学诚就已经说过：

诗赋前三种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而后二种之别类，甚晓然也。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②。

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

①《汉书艺文志书后》，《左盦集》卷八。 ②《校讎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

《七略》为蓝本，它对古赋的分类也本之二刘^①。若照章、刘的说法，那么，总集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楚辞类小序：“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又《楚辞章句·提要》：“刘向哀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②《楚辞》的纂辑也出刘向之手，这是总集滥觞于西汉的又一证据。

但有人认为总集的起源还可以再往上推。如魏源说：

有笔诸书矢为文字之言，即有整齐文字以待来学之言。请言《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载记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网罗放失，纂述整齐文字之学，自夫子之纂《六经》始。后世尊之为经，在当日夫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③。

这就把总集的出现追溯到孔子纂辑《六经》的春秋时代，即较刘向校书时提前了四百多年。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六经》中的《诗》、《书》，就确是“一代诗文之汇选”。不过，不管是西汉说还是春秋说，都

^①参看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七略佚文序》。^②卷一百四十八。^③《国朝古文类钞序》，《魏源集》（上）。

是指总集的萌芽时代说的。这一时期的总集，除《楚辞》外，收录的作品大都不标作者姓名（有主名的只是极少数），其来源也往往不易考察。不象后来的总集作品都有主名，且经过纂辑者的编选，其来源多出于别集。两者的情况显然不一样。还有一层，《诗》、《书》已被后世尊为经典；《楚辞》自《隋书·经籍志》把它另立一类之后，目录书相沿承用，也从来不为应列入总集。因此，严格地说，真正的总集应该是指后来的总集，即从《建安七子集》、《善文》开始的总集。但二书已佚，故论者多以《文选》为总集的嚆矢。这正如探黄河之源，只到积石山也就可以了，不必再上溯星宿海了。

(二)

总集，就是从《文选》算起，也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总集，仅就史《志》所著录的说，数量就很可观，试看下表：

书 名	著录部数	著录卷数	备 注
隋书·经籍志	一百四十七	二千二百一十三	原注：“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八百九十二	一万二千零二十八	

书 名	著录部数	著录卷数	备 注
新唐书· 艺文志	九十九	四千二百二十三	原注：“李淳风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八百一十三卷。”
宋史·艺 文志	四百三十五	一万零六百五十七	
元史新编 艺文志	八十一	九百五十四	内十五部无卷数
明史·艺 文志	一百六十二	九千八百十	
清史稿· 艺文志	五百零三	一万五千四百二十	

应该指出：过去的目录学家对图书的分类不是很严格的，常有应归入总集而未收，或应剔出而未去的。又，各家补《志》增补的总集为数还不少，这里统未列入。所以上表所示只是大概的情况，不过用来说明总集历代都有作者，而且其总数在不断地增加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小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① 据此，知总集可分两大类：

一是务求全备的总集。这一类就是李元度所说的“征文”^② 魏源所说的“广存”^③。特点是不问作品

①卷一百八十六。 ②见《湖南文征序》（代李瀚章作），《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四。 ③见《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

的好坏长短，一律收罗，甚至连片语断句也囊括无遗，目的是力求做到一个“全”字。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全金诗》、《全元散曲》等等就是①。（当然，它们也有程度不同的遗漏，还不是真全。）也有书名虽未标明“全”，但实际上也是力求完备的，象《文苑英华》、《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清文汇》、《乐府诗集》、《古诗纪》、《历代赋汇》等等就是。这一类，品种不算多，但每一种部头都大，除个别的以外，往往都多到百卷以上，乃至千卷（如《文苑英华》、《全唐文》）。编纂这样的大书，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编者是十分辛劳的，但钩稽、甄录，萃万编以成一帙，可为后人节省无数时力，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

一是采摘精华的总集。这一类，就是李元度所说的“选文”②，魏源所说的“审取”③，通常称为“选本”。《文选》以后的现存选本，数量极多，所以有人甚至主张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另立“选类”一门④。

为了便于称说起见，我们不妨把前一类称为“总集甲”，后一类称为“总集乙”。

总集甲，按时代分，有两种：

①《全宋词》三百卷，今人唐圭璋编。《全元散曲》二册，今人隋树森编。其余各书，见本书正文或附录。以下凡见于本书者均不再注。 ②见《湖南文征序》（代李瀚章作）。 ③见《经世文编五例》。 ④清管世铭说，见《韞山堂读书偶得》。

一是专辑一代，如上举的《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等是。

一是兼收各代，如上举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诗纪》、《历代赋汇》等是。

按地域分，也有两种：

一是专辑一地，如《丹阳集》、《姚江逸诗》、《临川文献》、《金华文略》等①。

一是兼收多地，如《濂洛风雅》、《广东诗粹》、《山左明诗钞》等②。

此外，又有按体裁编录的，如《万首唐人绝句诗》、《古乐苑》、《三家宫词》之类。按家族编录的，如《窦氏联珠集》、《吴越钱氏传芳集》、《文氏五家诗》之类③。如此等等，种类是繁多的。

①《姚江逸诗》一五卷，清初黄宗羲编。收录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一县的诗，自南齐至明，以时代为序。（清倪继宗有《续姚江逸诗》十二卷，续至清代。）《临川文献》八卷，清胡亦堂编。收录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一县的文，自宋至清初，都采自专集，但有删削。《金华文略》二十卷，清王崇炳编。收录金华（今浙江金华地区）一郡之文，始自汉杨乔，迄于清徐腾，共一百十七人。崇炳自作亦辑入。

②《濂洛风雅》六卷，元金履祥编。选辑周敦颐，二程（颢、颐）等四十八个道学家的诗，而冠以《濂洛诗派图》。《广东诗粹》十二卷，清梁善长编。采辑上起唐、下至清的广东诗，凡四百十三家，一千五百五十余首。《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清末弼编。采辑明代山东一省的诗，凡四百三十一人，依例全仿朱彝尊《明诗综》。

③《三家宫词》三卷，明毛晋辑。三家指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和宋王珪，各有七绝一百首。《窦氏联珠集》五卷，唐褚藏言编。收窦常、窦牟等兄弟五人的诗，各一卷。《吴越钱氏传芳集》二卷，明钱筠等编。收钱氏一家的诗，从钱穆起，到明钱淮，共六十二人，一百三十一首。《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明长洲（今江苏苏州市）文征明一家三代五人的诗，当亦文氏所辑。

以上几种实际上常有交叉，如专辑一地的总集中，有只限于一代的，象《浙元三会录》、《山左明诗钞》等就是。有不限于一代的，象《吴都文粹》、《广东诗粹》等就是^①。其他可以类推，不必列举了。

总集乙的流别更多，它可以因区分的标准不同而有各种类型。但为了避免繁琐，以下只按总集乙的发展历史把它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前期的总集。这一期，可以晋朝挚虞《文章流别集》、梁朝萧统《文选》、陈朝徐陵《玉台新咏》为代表。其特点是：（一）分体编选诗文；（二）有论或序，说明编选的旨趣。

挚虞《文章流别论》的佚文，见严可均所辑《全晋文》卷七十七。这些佚文，大都是论诗、赋、箴、铭等文体的，所以《晋书》本传说“（虞）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小序也说：“（《流别集》）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由此可见，《文章流别集》是“分体编录”的，并有说明各体文章源流正变的“论”。萧统和徐陵的书，也是分类的，虽然没有论，但都有序。序相当于论，因为两者的作用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一类的书流传至今的很少，但它的影响却很

^①《浙元三会录》不分卷，明杨守阯编。辑录浙江解元三次文会唱和的诗文，都是明亮宗成化年间所作。《吴都文粹》九卷，宋郑虎臣编。所收吴郡遗文，都是从范成大《吴郡志》中辑出的。

大，特别是在体例方面。后世的总集几乎没有不分类的，又差不多都是先定标准，然后才从大量的诗文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些都足以证明。

又一类是后期的总集。这一期，从唐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时间既长，成书也多。其特点是：不仅收录作家的作品，而且还加上编者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这里又有几种情况：

（一）作者姓名之下，各有评论，并标举警句。象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等等，就属这一类。

（二）为作者作小传。上举《河岳英灵集》等书，评论之外，也兼载作者的字号、里贯、仕历，但都很简略。从姚合的《极玄集》起，总集才有比较详细的作者小传，可为知人论世之助，有些材料还可据以订补史书。这是很好的办法，后来的总集大多沿用。

（三）有批点标抹。评点古书之风起于北宋，用之于总集，则自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始。此后，楼昉《崇古文诀》、王霆震《古文集成》、谢枋得《文章轨范》等书相继并出，成为一时风气。到了明、清，这一类的书就更多了。

（四）圈点、句读、注释、评论、考证、小传兼而有之。这一类，可举清代康熙、乾隆两朝编的《古文渊鉴》、《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等书为代表。当然，上举各项，这些书里也不是全有，但大多数是具备的。

此外，象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既分类，每类

又有总序，每曲又有解题，可谓别具一格。但这种体例后来沿用的极少。

总集乙的模式大概不外上述几种。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①这是从编选的旨趣着眼来区分总集乙，也是一种分类法。

大凡比较著名的选家，操持选政，都各有宗旨，其去取决非漫无标准。如《文选》，选者就自称所选的文章重在能文，而不重在立意。又如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文就偏重论理，而不论文。就诗来说，如唐元结《篋中集》只取古淡之作，令狐楚《唐御览诗》则专收雍容诸雅者，五代韦毅《才调集》又以秾丽宏敞为宗：都各有特色，也都明显地反映出选者“自己的意见”。由此可见，上引鲁迅先生的话，不仅指出总集乙有两种类型，而且也告诉我们要注意选者的意见（也即选者的文学主张），这后一点尤其重要。

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实缪荃孙代作）的附录里，有“群书读本”一项，为初学开列了必读书三十种。其中的《秦汉文钞》^②、《文选》、《六朝文絮》、《唐

^①《鲁迅全集七·选本》。 ^②《秦汉文钞》十二卷，明冯有翼编。收秦文二卷，西汉文五卷，东汉文三卷。

宋诗醇》、《唐宋文醇》、《古文渊鉴》、《瀛奎律髓》、《四六法海》、《花间集》等九种都是总集，差不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张氏说：“此类各书，简洁豁目，初学讽诵，可以开发性灵。其评点处颇于学为词章者有益。”鲁迅先生也曾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了一份研究中国文学的参考书目，共计十二种。其中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丁福保的《全上古汉魏六朝诗》两种也都是总集^①。鲁迅先生因此在《选本》一文里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者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于出选本。……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由此可见，对总集的作用和影响，学者们是有充分估计的。

但是，正由于上文所说总集的编选者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鲁迅先生又特别告诫说：“读者的读选

^①《鲁迅全集八·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象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醜。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①鲁迅先生既肯定了总集的作用，又指出总集的局限，这是辩证地看问题，比较全面。我们今天读总集也应该具有这种分析的眼光。

(三)

总集的体例，上文结合总集的类型已经谈了一些，但还有一些也值得注意：

其一，编者对所选的作品可以增、删、移动。如《文选》卷四十《奏弹刘整》李善注说：“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也。”足见李氏所补都是昭

①《鲁迅全集七·选本》。

明删去的。又如卷三十三《九章·涉江》，《文选》删“乱曰”以下五十三字。卷二十九《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一首，删“寄语世上人，道士慎莫作”十字。这是删的例子。又如卷一《西都赋》，较《汉书》多“众流之隈，汧流其西”八字。同卷《东都赋》后的诗，较《汉书》多“嘉祥阜兮集皇都”七字。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安书》，较《汉书》多“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十二字。卷四十五东方朔《答客难》，较《汉书》多“天下无害灾”二十七字。这是增的例子。又如卷五十六《石阙铭》，依梁武帝改十四字。同卷《刻漏铭》，依梁武帝改一字，依沈约改二字。这是改的例子。又如卷四十二曹植《与吴质书》，李善注引别题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于“和氏无贵矣”之下，以便与吴氏的话相应。这是移动的例子^①。这些做法，后人有遵用的，也有反对的，意见还不一致。我们以为选家必要时对选文加以增删改动是可以的，只要对读者有好处就行，不一定墨守原文。不过，遇到这种地方，如果能加上校注，说明依据以及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那就更好了。

其二，可以选入同时作者的作品。《文选》选诗，因何逊还在世，就不选其诗。后来的选家多用此例，以为这样可避免标榜。但也有不用此例的，如唐令

①以上各例均采自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文选自校本跋》。

狐楚的《元和御览诗》选录张籍、杨巨源等人的诗，就都是同时的人。明代选本，如李攀龙《古今诗删》^①、汤绍祖《续文选》，更是大量地选入同时作者之作。魏源作《经世文编》，据陆燿《切问斋文钞》收入刘大櫆、戴震之例，也收入同时人的文章，并说：“切时之言，无须身后始出。”钱泳也说，选诗以盖棺论定横胸中，其实没有道理。古人有以一首一句流传的，只要是可传的就选，何必论其生死？选诗不比修史，是无须死后才能立传的。上述这些人的看法显然很一致，但也有相反的论调。如方苞选《钦定四书文》^②，就不录见存人之作，以为作者往往文与年俱进，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订，有与初作绝不相类的，故不宜收入同时人的文章。这些说法，各明一义，都有一定的道理。看来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但主要有一条，即入选与否要以文章的好坏做标准。如果执定一说，那就反而成了胶柱鼓瑟了。

其三，还可以选入已作或附录家族的作品。汉代刘向辑《楚辞》，收入自作的《九叹》；王逸作《楚辞章句》，附入自作的《九思》，已开选录已作的先例。就总集说，陈朝徐陵的《玉台新咏》编集自汉至梁的诗歌，而卷八有《杂诗》四首，卷九有《杂曲》二首，都是陵作，大概即援刘、王之例。后来唐芮挺章《国秀集》，

①《古今诗删》三十四卷，录历代诗，每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迄于明代，宋、元诗则概不入选。 ②《钦定四书文》四十七卷，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方苞奉敕编。

录入己作二篇，宋黄昇《花庵词选》录入己作四十首，魏源《经世文编》也录入己作十七篇。这种例子就越来越多了。

又有附入家族作品的，如元好问《中州集》，选辑金源一代的诗，而其父、兄的诗也收了进来。明代邱吉《吴兴绝唱集》^①，选元、明二代湖州人的诗，不但收入己作，也选录了其父的诗。如此之类，虽然协子公论，但未免涉于私情，毕竟是不足为训的。

此外，有些总集，由于卷帙较重，研读有困难，于是选家就删汰繁芜，另成简编，借以便利读者。如明黄宗羲的《明文海》多到六百卷，后来选者自己把它删成《明文授读》，只有六十二卷。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有七十五卷，周学熙把它删成《古文辞类纂约选》，只有十三卷。如此之类，例子还有不少，读者不可不知，所以这里附带地说一下，但这已与体例没有多大关系了。

(四)

一九六五年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约我写一本《历代文学总集选介》。当时，我正在前合肥师范学院任教，工作虽忙，但考虑

^①《吴兴绝唱集》四卷，续集二卷，成于明武宗正德末年，所录都是元、明二代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人的诗，但亦间及流寓。

到许多诗文总集至今还没有专论，有向读者介绍的必要，就答应了。后来我就利用教学工作的余暇，陆续写了几篇初稿，也积累了不少的资料。不料所谓“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经过几次“抄检”，我的所有收藏荡然无存，《总集选介》的一些草稿连同有关资料，当然也“在劫难逃”，全部不知去向了。十年内乱，万事瓦裂，这事更无从谈起。霹雳一声，“四人帮”粉碎了，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废俱兴，我校（这时已改名为安徽师范大学）的学报也复刊了，又需要选登一些学术性的文章。编者索稿，我手边一时没有现成的，因函请上海寄回他们所保存的八篇，略加修订补充，即交学报发表，借以征求朋友和读者的意见。后来旧稿登完了，新稿却因工作繁忙而只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赶写了三篇。现在把新旧稿汇集在一起，又作了一次修改，并加写了《导言》。编目的先后排列，也改以作者时代或成书年代为次。又因书中提到的总集名很多，不能一一随文加注，所以另写了一篇《古代诗文总集要目述略》，作为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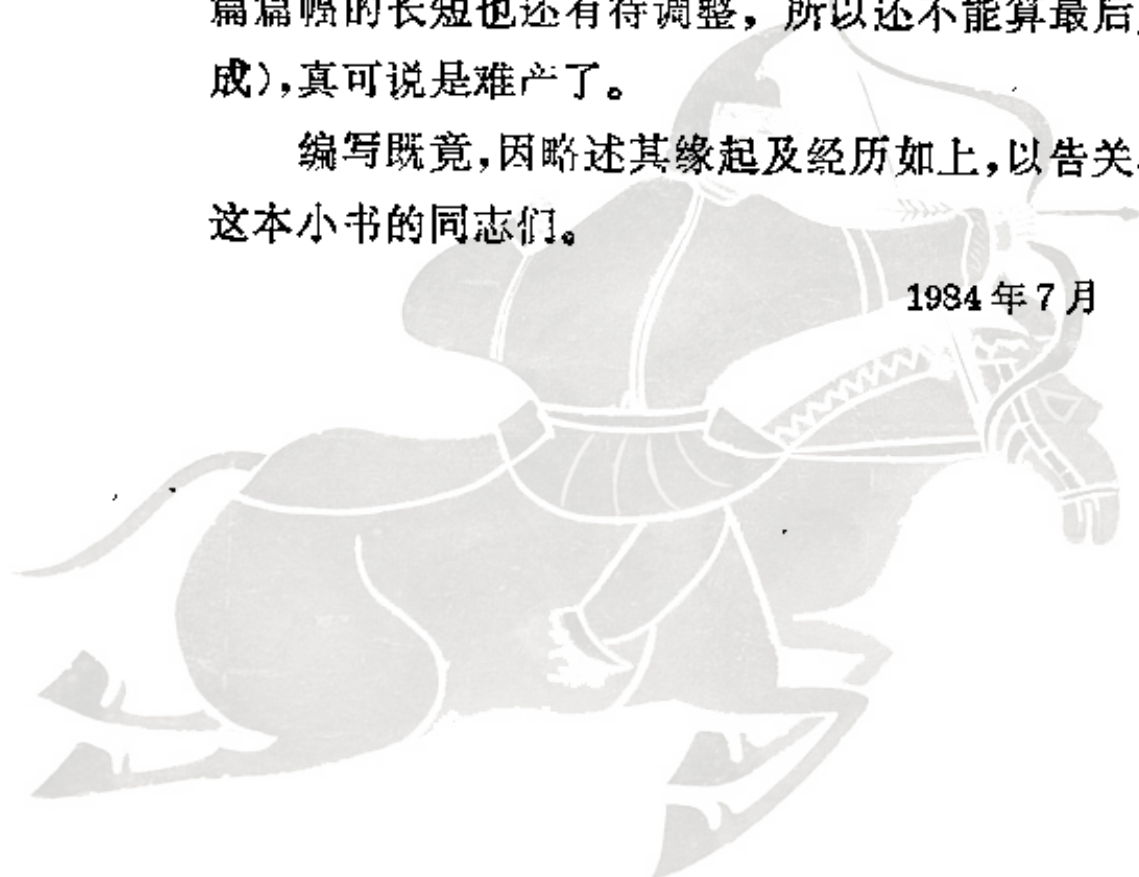
我原先计划把历代诗、文、词、曲以及传奇、小说等等的总集选出有代表性的若干种，各撰评介文字，共计五六十种。后来考虑到总集的卷帙大多繁重，有关的资料又散见群书，浏览、搜集，组织成文，统非易事，而我能抽出的余暇苦不甚多，因而变更计划，

缩小范围，改书名《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为《古代诗文总集选介》，作为第一辑。以后如有可能，再续写其余各辑，但愿这个想法能够逐步实现。

一本小书，前后经过二十年，才得终于勉强写成（因为有些重要的诗文总集这一辑犹未收入，已收各篇篇幅的长短也还有待调整，所以还不能算最后完成），真可说是难产了。

编写既竟，因略述其缘起及经历如上，以告关心这本小书的同志们。

1984年7月



獵古資源

一、《文选》

《文选》，南朝梁萧统编。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徐州市)人，武帝(萧衍)长子。崇信佛教，提倡文学，早死，有文集二十卷(今残存六卷)。传见《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统死后，谥为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因此也称《昭明文选》^①。

东汉以后，文人的别集渐多，读者全看有困难，选读也不容易，于是选本应运而兴。象晋代杜预的《善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②，就是这一类的著作，只是后来都失传了。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以《文选》为最古。它的编纂，约在梁武帝普通三年至大通元年间(公元522—527年)^③，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多年。

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序》：“总集自晋有之，

①萧统又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见《隋书·经籍志》，均早佚。②杜预《善文》五十卷(一作四十九卷)，也见《隋书·经籍志》，已佚。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也见《隋书·经籍志》，今残存十二条。③详见今人何融《文选编纂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第七十六期)、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文史哲》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而无以选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迄梁百三十余家之文为《文选》，至唐而盛行。”总集以“选”名书，的确起于萧统^①。自此以后，文选、诗选、词选、曲选之类就多起来了。

据近人考证，萧统做太子时，曾经聚集了许多著名文人在他的周围，其中刘孝绰、王筠、殷芸、到洽等人，大约都参加了编纂《文选》的工作；还有《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可能参与其事^②。所以《文选》实出于集体之手，只是成书之后由萧统一人署名罢了。

《文选》选录东周至梁八百年间的各体文章，分三十八类^③。有些类，下面再分小类；类分之中，又各以时代先后为次。三十八类，可以大致概括为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计诗歌四百三十四篇，辞赋九十九篇，杂文二百一十九篇，共七百五十二篇。《文选》的“文”是广义的，所以它把诗歌和辞赋也包括在内。

萧统曾为《文选》写了一篇有名的序文。序文指出《文选》选录文章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④。从今

①杜、挚二家之外，魏曹丕《建安七子集》（见清姚振宗《三艺文志》）、宋刘义庆《集林》，梁沈约《集钞》之类（均见《隋书·经籍志》），也都不以“选”名书。②参看上举何融、殷孟伦文。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明杨慎《升庵外集》卷五十二都说高斋学士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也曾参加《文选》的编选工作，但史无明文。

③三十八类是：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④详见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的标准》及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文集三·文史论著》）。

天看来，两句意思是说：文章的立意谋篇，要出于精心思索；文章的思想内容，要用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说，文章应当要求文质并重，也就是要求内容、形式都好。“沉思”、“翰藻”，是《文选》选文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详近略远，也就是时代较近的，入选的就增多。例如：就作者论，周代只有四家，西汉也只有十八家，而晋代便有四十五家。就作品论，晋代以前，屈原十篇，宋玉十一篇，司马相如七篇，曹植最多了，也只有三十二篇；晋代以后，陆机一百十三篇，谢灵运四十一篇，江淹三十五篇，数量都较多。显然可见，入选的多少，不是按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按时代的远近来衡量的。有人说，《文选》不收同时生存的作家，所以何逊等人的作品都来入选^①。这大概也可以算做一条次要的标准。

《文选》编成时，据说有千卷之多，后来删定为三十卷^②。可见当时选文的标准是很严的。《文选》所说的“文”，同现代人所说的文学作品还不完全一样，但毕竟接近一些。从历史上看，先秦两汉时代的人，对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还不很清楚，六朝以

①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按：《文选》收入的梁代作家，有任昉、江淹、邱迟、范云、徐悱、刘峻、沈约、虞羲、陆倕等九人，都死于《文选》成书之前。当时生存的，如何逊、刘孝綽、王筠等，都未入选。 ②可参看清朱彝尊《玉台新咏书后》（《曝书亭集》卷五十二）。

后认识才逐渐明确。《文选》以总集的形式体现了当时比较进步的文学概念，并精选了大量的代表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诵习和研究的方便。它所收录的一百三十个作家（姓名无可考的在外），其中有不少人的文集早已失传，他们的作品，也仅仅由于《文选》的选入，才得以保存下来。它的分类，一般说来，也能够反映汉、魏以来创作日益发展、文体日益增多的历史现象。这些，应该说，都是《文选》的可取之处。

《文选》成书之后，一些早于它的文学总集就渐归淘汰^①。它取代了它们，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从隋代起，研究《文选》就成为专门学问，号称“文选学”^②。唐代以诗赋取士，士子必须研读《文选》，连伟大诗人杜甫也要自己的儿子“熟精《文选》理”^③。宋代重辞科，当时也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④。元、明两代研习《文选》的也很不少，清代探索更勤，成书更多。《文选》所选的文章，后人不但把它们当做范文读，而且当做字书、类书看；《文选》所选的诗歌，后来也成为揣摩的典范，称为“选体”。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文选》为历代所重视。

①早于《文选》的总集，除了上举曹丕以下诸家之外，还有宋谢灵运《赋集》、《诗集》等，见《隋书·经籍志》，也都亡佚了。

②见清汪之昌《唐人汉书文选之学考》（《青学斋文集》卷十九）、今人钱锺书《管锥编》1400—1401页。

③《宗武生日》诗，见《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七。宗武，杜甫子。

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

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谈到“选本的势力”时曾说：“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①这是很对的。

萧统选文止于梁初，后人以为不足，纷纷续作，于是《续文选》、《广文选》、《文选补遗》之类，先后出现了十余种。但这类补续之作，大都质量不高，也不受人注意，有些简直已若存若亡了。这类书之外，几乎每一朝代都有不少的文章选本，有的书名里也有一个“选”字。这些选本，在体例、编排等方面，也往往受《文选》的影响。

萧统选文，从表面上看，似乎能够兼顾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但他心目中的内容，主要只指题材，并不重视作品的思想意义，特别不重视它的进步意义；他心目中的形式，也主要只指辞藻、典故、对偶和声律。因此，他对文章的看法同现代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还有很大的距离。他不选梁初盛行的宫体诗、咏物诗之类，是由于这些诗内容空虚，这是对的；但他对一些有进步意义的论文（如晋裴頠《崇有论》、梁范缜《神灭论》之类）也一概不选，这就表明他不是真正看重文章的思想内容。他宁愿多选颜延之的那些雕绘满眼的诗，而对汉、晋以来的素朴的乐府、民歌则大

^①《鲁迅全集七》。按：《世说新语》，历代目录书都把它列入小说类。鲁迅先生以为“也是一部钞撮故事之作”，所以也把它看成选本，与《文选》并称。

都舍弃，这又表明他对形式的看法，也是很片面的。他不选经、子，史书也只收赞、论，在《文选序》里曾列举了一些理由。但这三类书（特别是子、史二类）中也有不少篇章是合乎“沉思”、“翰藻”的标准的，合标准而不取，又怎样自圆其说呢^①？《文选》的分类，上文曾指出它的好的一面；然而这种分类究竟过于琐细（三十八类已经够多的了，诗又分二十三小类，赋又分十五小类，如此之类，更是十分繁碎），且有许多“类”的定名不当，类与类的界限也不清，所以后人迭有讥议^②。此外，《文选》又收入一些伪作，足见考订、鉴别也有疏失^③。这些方面，都是《文选》的缺点。

总的看来，《文选》是忽视思想内容、偏重形式的。萧统自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之一，参加编纂之列的也都是些封建官吏。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所选录的文章，只能是对封建统治有利的，而不可能是相反。这从全书都可以看出，姑举“论”类为例。在这一类中，《文选》选了班彪《王命论》、曹丕《六代论》、李康《运命论》、陆机《五等论》，都是宣扬符瑞迷信的宿命论和宗圣、尊王的奴才思想的。至于

①近人章炳麟《文学总论》（《国故论衡》中，《章氏丛书》本），曾详细谈到这一点，可以参看。②宋苏轼，清姚鼐、章学诚等人都曾在这一问题上批评过萧统。③《文选》所收，除李陵《答苏武书》前人多已指出是伪作外，清赵铭又指出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也是赝品，见《琴鹤山房遗稿》卷五《书文选后》。

有进步意义的论文，他不但不敢选上举的《崇有论》、《神灭论》以至更激烈的《无君论》^①，就是桓宽、王充、王符、崔实、仲长统等人抨击现实的政论，也不敢稍一涉及。这正是萧统等人阶级立场的鲜明表现。自然，《王命论》等文骈俪化的程度更深一些，但选文而仅注意这一方面，那不是形式主义又是什么呢？

《文选》原只三十卷，唐显庆年间（公元656—660年），李善（约公元630—689年）为作注释，并扩充为六十卷。善字泰和（一说字次孙），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人，是当时有名的学问家，有“书簏”之称。他注《文选》，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屡易其稿，用力极勤，历来推为名作。它的长处很多，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态度比较谨严，能够实事求是；二、征引浩博，保存了大量的资料，可供后人多方面的利用。就前一点说，李善作注，能够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杜撰故典，乱加解释，所以引证都确实可信。他对一些出处无从查考或文义不大了然的，往往老老实实地注明“未详”；对前人已有较好注解的，也往往尽量采用，并标明姓名^②，不肯改头换面，掠为己有。他注书时，定下凡例二十二条，散见书中；此外，后人又就原注推寻出一些条例^③。这些，不仅

①《崇有论》反对清谈，《神灭论》反对佛法。《无君论》反对封建君主制度，晋鲍敬言作。 ②李注采用旧注并标明姓名的，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说有二十三人，孙志祖《读书脞录续编》则说可考的只二十人。 ③近人骆鸿凯《文选学》列举了二百二十多条。

说明了他作注的细密，而且也体现了他的严格的求实精神。就后一点说，有人做过统计，李注征引的书，共二十三类，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引用旧注二十九种尚不在内^①。李善的时代，许多古书还未散亡，他所引用的又都注明姓名、篇目，因之大量的有主名的文籍就得以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下来。近代的辑佚家、笺注家都非常重视李注，他们在辑录古书、古注时，往往尽量利用它^②；有些学者还利用它做著书的原材料^③。此外，李注所据都是唐以前的古本，大多较今本可信。有些旧籍残缺不完或经后人窜改的，也可据李注加以考订。这样一来，李注就又成了校勘家的宝藏了。总之，李注网罗繁富，可供多方面的利用，因而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李注也有缺点，主要是“释事忘义”，就是只解释文字或典故，而忘记了疏通文义。另外，选择不精，望文生训，以及割裂双音词等毛病，有时也不免。不过，比起它的优点来，这些总算是次要的了。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铉、吕向、李周翰等五人的《文选》合注本出现，世称“五臣注”。五臣注诠释文句，间有寸长，然贬低

①据骆鸿凯《文选学》。②清人辑郑玄《易注》、《尚书注》，服虔《左传注》，以及辑字书《字林》、《仓颉篇》、子书《庄子新论》、《典论》等，都充分利用了李注，此外尚多。可参看清李祖望《楔不舍斋文集》卷二《文选注考》。③如明朱谋瑋《骈雅》，清杭世骏《续方言》、王念孙《广雅疏证》等是。

李善，高自位置，书中实多窃取李注，又多穿凿附会，误引妄改，价值远在李注之下。此书在南宋时虽曾一度流行，但不为学者所重。南北宋之交，又有人把李注和五臣注合为一书，称为“六臣注”。这种本子也流传至今。

研究《文选》的书，历代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清胡克家《文选考异》十卷，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梁章钜《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胡绍瑛《文选笺证》三十卷，朱珔《文选集释》二十四卷，以及近人丁福保《文选类诂》、骆鸿凯《文选学》等。研究李注的书，有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四卷及今人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八卷等。

《文选》的版本极多。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较好，也较通行。

獵古資源

二、《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十卷，南朝陈徐陵编。陵（公元507—583年）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梁时，官东宫舍人；入陈，领大著作，累官至中书监。陵是梁陈间著名文人，诗文绮丽，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有《徐孝穆集》三十卷（久佚，后人辑存二卷），传见《陈书》卷二十六、《南史》卷六十二。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三：“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根据这段记载，结合《玉台新咏》本书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推知以下几项：（一）这书是徐陵在梁初所编，所以书中称简文帝为皇太子，元帝（萧绎）为湘东王。今本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是后人追改的。（二）这书是在萧纲的授意下编选的，编选的目的在于：扩大艳诗的范围，大量收入历代的言情之作，使这个选本既包括了宫体，也包括了其他一些流派和风格，这样就可以为宫体找历史根据，从而掩饰它的腐朽和无聊。（三）《玉台新咏》又名《玉台集》。大约宋代以前，二名并

用。有人以为后者只是前者的简称，那是并不正确的①。

刘肃所说的“艳诗”、“宫体”，是萧纲提倡起来的一种诗体，徐摛、徐陵父子以及庾肩吾等人，也是这种诗体的主要作家。宫体的“宫”，指东宫。萧纲是住在东宫的太子，喜欢写这种诗，所以称为宫体。宫体诗的内容主要是写闺情，又特别多写艳情或色情，因此也称“艳诗”、“艳情诗”或“艳歌”。这种诗，是封建统治阶级荒淫堕落的生活和变态的色情心理的反映。闻一多先生说它“专以在昏淫的沈迷中作践文字为务”，“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②。《隋书·文学传序》也说它是“亡国之音”。这些批评，都不算过分。

徐陵的《玉台新咏》正是以宫体为核心部分，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艳情。这一点，前人已经指出。如明胡应麟就说：“《玉台》但辑闺房一体。”③清纪容舒也说：“《玉台新咏》非词关闺闼者不收。”④徐陵为《玉台新咏》写了一篇有名的骈体的序文，里面说：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以为《玉台集》只是《玉台新咏》的省文。其实《玉台集》一名，唐、宋人常用。如唐林宝《元和姓纂》、宋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书，就都称《玉台集》。《新唐书·艺文志》有李康（一作李康成）《玉台后集》十卷，序中称徐陵的书为“前集”。《宋史·艺文志》也有《广玉台集》。这些都可证明《玉台集》不是省文。②《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三。③《诗薮》外编卷二。④《玉台新咏考异》，《畿辅丛书》本。

“……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这是他为自己的选本（也就是为宫体）抬高身价，以为它可与向来称做经典的《诗经》相比。其实他所选的，虽然也有一些“往世名篇”^①，但绝大多数都是内容空虚，文词浮艳之作；特别是萧纲的作品，选入的多达一百零九首，多半是些十分堕落的诗，也就是典型的宫体^②。这种诗怎么能够与《诗经》相提并论呢？

《玉台新咏》的编成约在公元531年前后，略晚于《文选》。书中所选，卷一至卷八是汉、魏、晋、宋、齐、梁各代的五言诗；卷九是历代歌行（多半是文人的拟乐府），大多是七言，还有少数的杂言和一首六言；卷十是历代五言二韵的诗，也即古绝句。宋刻本，一种有六百九十首（内有二首亡佚）；另一种有七百六十九首。明代以后的刻本，篇数迭有增加，次序也有窜乱。清代康熙初年，吴兆宜有笺注本，较宋本增多一百七十九首，共八百六十九首。这是比较通行的本子。乾隆中，程琰又取吴本加以删补，也很通行。

宫体诗有了《玉台新咏》这个选本，传播就容易，影响也更坏。陈、隋两代，基本上仍然沿着宫体的道路继续发展，甚至唐代也还受了一定的沾

①《玉台新咏·序》。 ②萧纲的诗是不值得批判的；他的诗题，如《娼妇怨情》、《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变童》之类，也是恶劣不堪的。

染^①。可见萧纲、徐陵一班人作俑的罪过是很不小的。

然而，这个选本尚非一无足取，它也还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下面试举出几点：

一、书中虽以宫体为主，但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例如古代著名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就是首先由此书著录的。又如它所选入的一些童谣、乐府^②，也都原出民间，不但声调优美，语言活泼，而且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心情，很可宝贵。有些文人作品，如枚乘、张衡、曹植、鲍照等名家的诗，以及不大出名的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拟乐府，也不失为佳作。另外，如《越人歌》（是一首译诗）、《乌孙公主歌》等，也各有特色，可备一格。大致看来，卷一、卷二和卷九、卷十所收好诗较多，对后世影响也较大；至于其他各卷，那就较少可读的作品了。

二、这书是《诗经》、《楚辞》以后保存至今的最古的诗歌总集，它记录了相当多的古代文献。《汉书·艺文志》收入的歌诗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早已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汉、魏、六朝各家的别集，

①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喜欢写宫体诗，也见《大唐新语》卷三。又，唐人也有学“玉台体”的，如《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九有皇甫冉《见诸姬学玉台体》一首（五古），卷三百二十八有权德舆《玉台体十二首》（十一首五绝，一首七绝）。②童谣有《汉时童谣歌》、《汉成帝时童谣歌》、《汉桓帝时童谣歌》等。乐府有《古乐府诗》、《近代西曲歌》、《近代吴歌》、《近代杂歌》等。

以及晋、宋以后的总集，保存下来的也为数寥寥。后世借以考见汉、魏、六朝乐府诗歌的，较早的书就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前者所收不全是诗歌，数量也较少。这样，后者就显得更为重要。有些诗，只是由于《玉台新咏》的选入，才保存了下来。象上举《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就是一例。曹植的《弃妇》，庾信的《七夕》，本集都未收，也因见采于《玉台新咏》才没有失传。这又是两个例子。象这一类的情况还有不少，不多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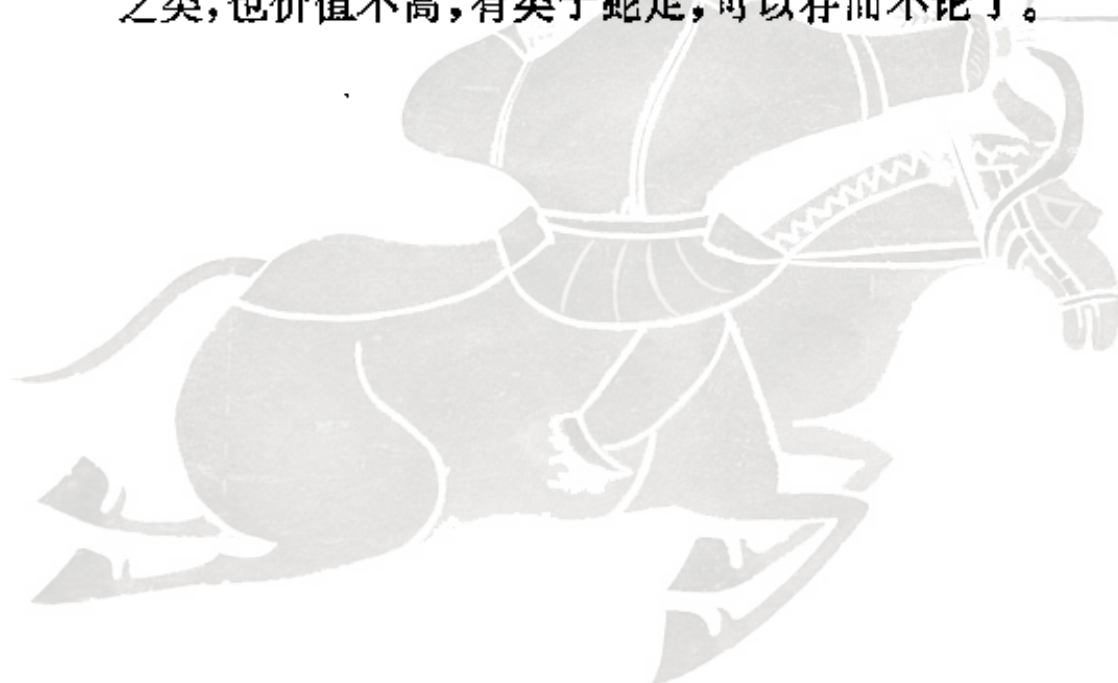
三、《玉台新咏》还可利用来校订别的总集。徐陵是六世纪的人，还能看到不少古书，所以采录多有依据。这对校订其他总集，很有用处。举例来说，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定为汉诗，据此，知实出晋代。又如梅鼎祚《八代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曹丕拟作。又如《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字句间有删改移动，也据此知古辞并非都是整齐的五言^①。诸如此类，都可用来参考比较。这也是后人比较重视《玉台新咏》的一个原因。

《玉台新咏》的各种版本，不但所收篇数有不同，字句、题目、作者等等，也有时彼此歧异。清初纪容舒作《玉台新咏考异》十卷^②，仿宋代方崧卿《韩文考

①《玉台新咏》与《文选》不同处很多，也各有短长，可参看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曝书亭集》卷五十二）、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六。②也有人说，这书实出纪昀之手，只是用他父亲的名义刊行罢了。

异》之例，聚合众本，详加考核，订正宋、明诸本错误不少。虽然还不免有所缺遗（如《永乐大典》所据宋本，纪氏未见到，即未采入。敦煌唐写本残卷后出，亦未及采。），但已经可以说成绩很不错了。近时南陵徐乃昌据明末赵均本影印《玉台新咏》，又参考各本，写成校记，用力也很勤，可与纪书并驾齐驱。

《玉台新咏》之后，还有一些续书，但大都亡佚；间有流传下来的，如明郑玄抚《续玉台新咏》（五卷）之类，也价值不高，有类于蛇足，可以存而不论了。



獵古資源

三、《文苑英华》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命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十七人,总阅前代文章,采撮精要,编为一书。后因昉、蒙等相继外任,又命苏易简、王祐、范杲与宋白等续修,至雍熙(也是太宗年号)三年(公元986年)十二月完成,取名《文苑英华》。凡一千卷,又目录五十卷。其中诗一百八十卷,为杨徽之所编,这是因为徽之擅长诗歌的缘故。

《文苑英华》是宋代有名的“四大书”^①之一,是上续《文选》的。《文选》止于梁初,它即起于梁末,时代恰相衔接。但书中所收的文章,南北朝只占十分之一弱,唐代则占十分之九强,所以这书实际上是唐代诗文的总汇。

《文苑英华》也是按文体分类的,体例与《文选》大致相同,但门目分得更为繁碎。如《文选》只分三十八类,这书就分五十五类;《文选》赋的子目只有十五,这书赋的子目就多到四十一。各类的分量多少不同,如赋有一百五十卷,诗有一百八十卷,碑有九

^①宋代四大书,指《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除《册府元龟》外,其余三书,都是太宗时所修。

十一卷，而书、论都只有二十几卷，有些类则只有一两卷（如弹文、移文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各体文章发展的情况。

唐代文章很盛，三百年中，名家辈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三百多家，存留至今的只七十六家，散佚的实居多数（文集失传的又多于诗集）。《文苑英华》成书时，距唐亡只有八十年，有许多书当时还在；宋初又先后平定了南唐、西蜀等国，尽得其藏书，凭借既厚，搜采较广，于是《文苑英华》的蕴藏量遂特别丰富。今就书中所收录的看来，有为他书所不载的，有为本集所遗漏的，也有名家别集久已亡佚而辑其逸文尚可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举李商隐、张说为例。商隐的《樊南甲乙集》早已失传，今本即由《文苑英华》录出。张说的《张燕公集》虽有传本，但只二十五卷，较原本少五卷，用这书互校，可以补出遗漏的杂文六十一篇^①。其实，这类例子多得很。象许敬宗、李峤、崔融、李华、萧颖士、孙逖、符载、梁肃等人的诗文，就是也可根据这书辑成专集的。明、清两代所编的一些诗文总集，如《古诗纪》、《文纪》、《全唐诗》、《全唐文》等，大都取材于这书；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也可从这本书中采辑不少的史料（书中书、论、碑、志等类保存的史料尤多）。由此可见，只

^① 卷一百八十六集部总集类一《文苑英华》提要。按：商隐佚文，清代自朱鹤龄以下，从事辑录的有数家；钱振伦又由《永乐大典》中辑出二百零三篇，然仍非完书。

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书是有一定用处的。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以诸家文集数量极多，各擅所长，榛芜相间，乃命儒臣辑录《文苑英华》^①。据此，似乎这位皇帝很风雅，很留心文事，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元刘壎《隐居通议》说：“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②这一段话才真正揭穿了封建皇帝的用心所在。我们要了解《文苑英华》编修的时代背景，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由于编书只是一种政治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书的质量如何，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关心、所注意的，所以当时受敕编书的人们也只是随手掇拾，草率从事；加之卷数太多，难以遍检，因而脱漏、重复、割裂、颠倒等等错误不可胜计。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再三命文臣校勘，但仍未能彻底订正。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周必大奉命校进。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必大又与彭叔夏重校完毕。这次校订比较仔细，叔夏并写成《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分二十一例，

①中华书局重印本第三册二二四七页。 ②卷十三，《读画斋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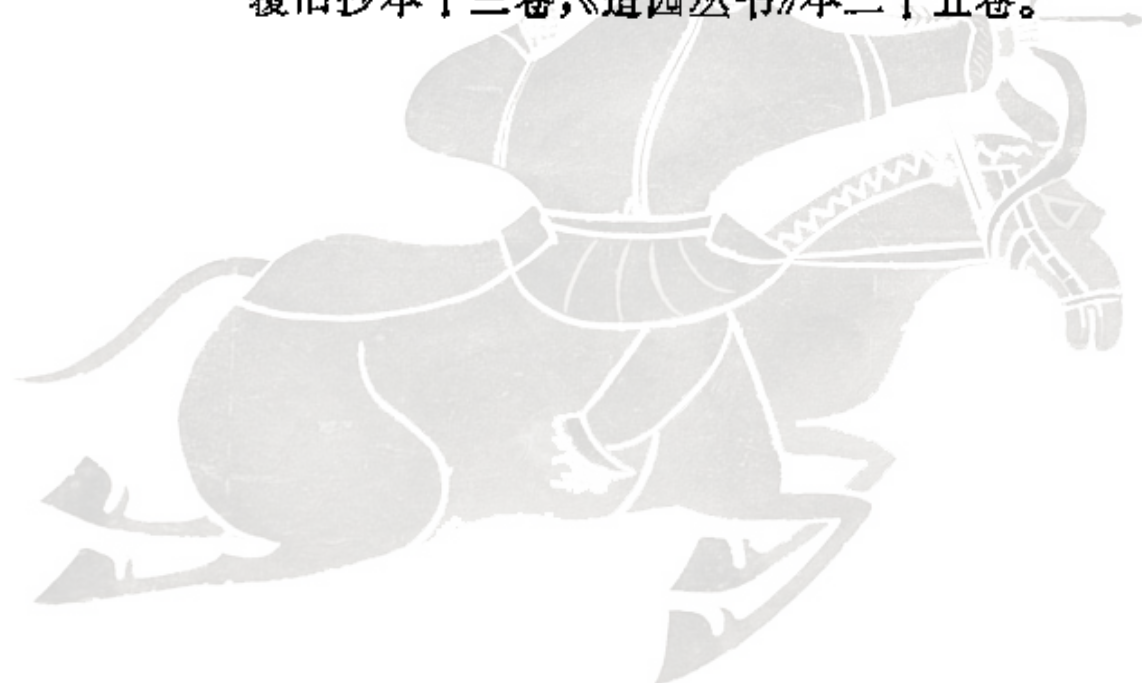
大致分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项，考核精密，书今存。《文苑英华》有南宋刊本，今残；足本为明刊本，也多错误。近人傅增湘聚宋、明刊抄诸本，细加校勘。其订正，分异字、疑字、脱讹、脱句、脱行、补注、错简、脱全篇、脱全叶、补校记（指补周必大校记）、补撰人十例；又改正格式行款的错误多处。从此，《文苑英华》才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①。1966年5月，中华书局采用现存一百四十卷宋刊本、八百六十卷明刊本，付影印。新编总目及篇名总目，分列各册之前。又据篇名总目编一《作者姓名索引》附于书后。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十卷，清劳格《文苑英华辨证拾遗》一卷，也附印于后。这个本子，阅读检索最便。

《文苑英华》卷数太多，难于通读。宋初，姚铉遍览群书，又从中选录了十分之一，成《唐文粹》一百卷，至今推为善本。另外，南宋高似孙有《文苑英华纂要》^②八十四卷，明陈仁锡有《广文苑英华》（一名《三续古文奇赏》）二十六卷，清宫梦仁有《文苑英华选》六十卷。或删繁就简，或续加搜补，但均无特色，也都不甚通行。

宋初编修大部头的书，是袭用唐代的故智。唐太宗建文学馆，用陈、隋旧臣修书，就是一种笼络人

^①见《藏园群书题记》卷八，傅氏自印本。 ^②《四库提要》卷一百三十一有似孙《文苑英华钞》四卷，采摘字句，以供文章之用，是类书，非总集。

才的方法^①。唐初也修了一些大书,其中性质与《文苑英华》相近的,有《文馆词林》,也是一千卷,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成书,是许敬宗等奉敕编的。原书分类纂辑先秦至唐代的各体诗文,网罗弘富,但到北宋时就已经亡佚了。流传在日本的约有几十卷,清末以来,有一部分又重新传入我国。所收诗文,也有不少是《古诗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书所不载的。有《佚存丛书》本四卷,《古逸丛书》覆旧抄本十三卷,《适园丛书》本二十五卷。



獵古資源

^①参看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四、《唐文粹》

《唐文粹》是北宋姚铉编纂的一部有名的唐代诗文选集^①。铉字宝之(一作宝臣),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人^②。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事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及《宋史新编》卷一百七十。

《唐文粹》编成于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九年以后,即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姚氏就死了,年五十三。死后,其子嗣复以此书进献,诏藏内府,并授嗣复永城主簿。此书本名《文粹》,南宋重刻时才加上“唐”字,后来就通称《唐文粹》了。

《宋史》本传和《艺文志》都称《唐文粹》一百卷,与今本相合。书中分古赋、诗、颂、赞、表奏书疏、文、论、议、古文、碑、铭、记、箴、诫、铭、书、序、传录纪事等十六类。书以“文粹”为名,而兼收诗赋,这是沿用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引宋陈善《扈虱新话》,说陈氏误认《唐文粹》的编者是徐铉。经检今本《新话》(《丛书集成初编》据《儒学警悟》排印本),实作姚铉,不作徐铉,可能是《提要》误记。 ②姚氏自署吴兴,这是指郡望而言。

《文选》以来总集的旧例。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卷，以十千为次；十千既尽，则用十一、十二等以别之。十六类中，古赋九卷，五十五篇；诗九卷，八百八十篇；其余各类共八十二卷，一千零四十五篇；合计一千九百八十篇。

姚氏自序说：“《文粹》谓何？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也。”这就是说，书中选录的都是唐代文章的精华。在这书选辑之前，李昉等已经编成《文苑英华》，号称唐文的渊藪^①。前人曾说姚书实本《英华》，而“铨择十一”^②。《英华》一千卷，《唐文粹》一百卷，卷数的确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但这话并不全对。考姚氏自序说：“铤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可见姚氏编纂这个选本时曾经浏览了大量的唐人诗文集，又费了十年的功夫加以研究、挑选，取材很广，决非仅限于《英华》一书。这是很清楚的。姚氏是北宋前期渊博的学者，其时去唐未远，唐集存留的还较多，所以他能左右采获，取精用宏。有些文章，如岑文本《谏太宗勤政政过书》之类，《英华》并未收入，《文粹》却选进来了。这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说姚氏选文曾经以《英华》为主要参考书，那是可以的；如果说《文粹》只是《英华》的节本，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唐文粹》在宋代已经很盛行，后世也很推

①②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文苑英华提要》。

重^①。究其原因，清费有容曾有几句概括的说明：“其书鉴裁精当，去取谨严，抗文苑之菁华，备艺林之掇拾。救六朝之沿弊，足继风骚；补一代之成书，自成月旦。”^②这几句话说得相当中肯，但未免太简单了。由今天看来，这书的长处主要在于：姚氏论文有自己的见解，选文也能别具只眼，善于鉴别，去取比较得宜；在浩瀚的唐文中，删繁就简，也便于一般读者的诵习；这就是它所以长期受到欢迎的缘故。

姚氏在《文粹序》里鲜明地提出自己选文的标准，“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他选诗、赋，都只取古体；选文，也以古质简奥为主，骈体入选的极少^③。可见是严格地按照标准来选的。序里又纵论古今文章，从先秦讲起，认为五经是发明“君子之道”的“大人之文”；屈平、宋玉之辞，“不陷于怨怼，则溺于谄惑”；汉兴，贾谊以后，人才辈出，象公孙弘、董仲舒、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都是雄才大文，足以张大德业，垂范后代；到了魏、晋，文风下衰，宋、齐以降，更为浇薄，然而这一时期的曹（植）、刘（桢）、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何（逊）、刘（孝绰）等，都

①《文粹》在宋代即盛行，见周必大《文苑英华跋》（《平园续稿》卷十一）。清王士禛说：“兹别裁具眼，颇贵重于世。”（《唐文粹选诗序》，《渔洋集》卷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九也说：“鉴裁精审，去取谨严，实为总集之善本。” ②《诂经精舍经课七集》卷十二《翻刊唐文粹书后》。 ③骈文只选了崔融《嵩山启母庙碑》、杨炯《少室山少姨庙碑》等少数几篇。四六文则一篇未选。

各有所长，篇翰可观。“至梁昭明太子统，始自楚骚，终于本朝，尽索历代才士之文，筑台而选之，号曰《文选》，亦一家之奇书也”。其后徐(陵)、庾(信)之辈，淫靡相继，下逮隋季，就统统不足采了。有唐三百年，文章特盛，陈子昂始振风雅，沈(佺期)、宋(之问)嗣兴，李(白)、杜(甫)杰出，燕(张说)、许(苏颋)大手笔，丕变习俗。此后文人虽多，然“惟韩吏部(愈)超卓群流，独高邃古……，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由此可见姚氏论文的宗尚所在。

唐代有进步意义的古文运动，至韩、柳并兴，本已取得成功；但晚唐、五代，偶俪之体依然流行，六朝以来雕章琢句的文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宋初，穆修、柳开等才开始推尊韩、柳，变骈文为古文，但声气未广，还不足以转移风尚。在欧(阳修)、苏(三苏)崛起之前，与穆、柳桴鼓相应、力矫颓风的，实以姚氏为最早。《文粹》的十六类中，有十五类都选入韩愈的作品，共八十二篇(内诗十八篇)；有十二类都选入柳宗元的作品，共五十八篇。分量特多，显得很突出。此外，李观、李翱、皇甫湜、张籍、元结、独孤及、梁肃、权德舆、刘禹锡、白居易、杜牧、孙樵等人的文章，也选了不少。这些人，或与韩、柳同时，或年辈有先后，都曾致力于古文，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姚氏把这

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选集在一部书里，让它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提供了诵习和揣摩的方便，这对古文运动无疑起了推动作用。这是《文粹》的一大功绩。

一般说来，姚氏选录作品是很谨严的。例如诗歌，除李白所作选了六十多首为数较多之外，大诗人王维、杜甫、岑参、高适等人所作则选得都很少；孟浩然只选一首；其他的一些名家，则连一首也未选。姚氏擅长近体，但书中对近体诗一概摒弃^①。这些情况，说明姚氏鉴裁很精，去取特严。又如韩愈文，姚氏极力推崇，但《平淮西碑》却选入段文昌作，不用愈作，这也足见他深知文体，并不阿私所好^②。上引的费有容文曾说姚氏编选《文粹》有三不可及，前两项是“存心之公”和“立识之精”^③。正因为存心公而立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唐文粹》条云：“考元阅《诗话总龟》，载铉于淳化中侍宴，赋赏花钓鱼七言律诗，赐金百两，时以比夺袍赐花故事。又江少虞《事实类苑》载铉诗，有‘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句，亦颇清远，则铉非不究心于声律者。盖诗文俚偶皆莫盛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铉欲力挽其灾流，故其体例如是。”

②《平淮西碑》，韩愈、段文昌两作，《文苑英华》卷八百七十二统加甄录，《文粹》则去韩存段。这一点，后人迭有争议。苏轼、姚范、俞正燮都以为韩作优于段，姚氏未免有心立异。王安石则批评韩文说：“笔墨虽巧终类俳。”（《和董伯懿裴晋公平淮将佐题名诗》）钱大昕更举出一些例证，说明“韩退之《平淮西碑》文，工则工矣，绳以史法，殊未尽善。”（《潜研堂文集》卷十三。）凌廷堪也称赞姚氏这样去取，是“深知文体”。（《校礼堂集》卷三十二《书唐文粹后》。）由今天看来，段文比较平实，韩文未免做作，姚氏的选择是恰当的。

③第三项是“取材之富”。

识精，所以才能做到坚持标准，严而持平。这实在是《文粹》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然，《文粹》也有缺点。以下列举几项：

第一，分类琐碎，各类之间界限也不清。这一点，王士禛、凌廷堪都曾指出^①，我们可以再举一些实例。如第十二、十三两卷，收录的是乐府辞，计分：功成作乐、古乐、感慨、兴亡、幽怨、贞节、愁恨、艰危、边塞、神仙、侠少、行乐、追悼、愁苦、鸟兽花卉、古城道路等十六类，这真是不伦不类！试问“愁恨”与“愁苦”有多大分别？姚氏把陈羽《湘妃怨》、王维《婕妤怨》列入幽怨类，张籍《征妇怨》、孟郊《古乐府杂怨》列入愁恨类，这又是根据什么道理来划分的？又如第三十三卷上下收录的是文，计分吊古、雷霆、军政、畏途、祛疠、责檄、伤悼等七类，这也是荒谬可笑的。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选文本身有错误，姚氏未能订正。清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五篇《跋唐文粹》，举出大量的例证（第一篇举二例，第二篇举一例，第三篇举六例，第四篇举六例，第五篇举三例），指摘姚氏沿讹踵谬，未加纠正。但其中有些篇至多只是持论偏颇，不一定就是错误^②。其他各篇则确有疏舛，如刘禹锡《宣

^①王士禛说，见《唐文粹选诗序》（《带经堂集》卷三十九）。凌廷堪说，见《书唐文粹》后。 ^②如独孤及《吴季札论》，张氏认为持论偏颇，不当收录。然崔祐甫《独孤至之神道碑》称“（及）著论延陵，君子谓其评议之精在古人右”。则此篇当时已得大名，姚氏选入，并非不当。陈越石《太甲论》、冯用之《权论下》，情况约略相似。

武军节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庙碑》云：“令狐，晋邑也，晋大夫魏颢以辅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文，《国语》所谓令狐文子是也。”考《晋语七》：“公（悼公）即位，使彘恭子将新军，使令狐文子佐之。”韦昭注：“文子，魏犇之孙，颢之子魏颢也。”《左传·成十八年》：“使魏颢为卿。”杜预注：“颢，魏颢子。”据此，知刘禹锡是误记，而姚氏也没有指出。

第三，收录颂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文章过多。过去的总集，一般都阑入一些颂扬之作，但《文粹》收录特多，显得更为突出。例如第一卷古赋类的前两篇就是歌颂“圣德”^①的李华《含元殿赋》和李白《明堂赋》。第二卷以下，接着就是李庾《西都赋》、《东都赋》，杜甫《三大礼赋》，梁肃《受命宝赋》，李白《大猎赋》等等，累牍连篇，层见迭出。又如第十卷诗甲收入古乐章十九篇，今乐章一百二十六篇，都是颂扬帝王的。第十九卷、第二十卷颂类收入李华《无疆颂》、张九龄《龙池圣德颂》、元结《大唐中兴颂》、柳宗元《平淮西雅》等等；第二十三卷赞类收入李德裕《唐武宗皇帝真容赞》等等；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则收入受禅文、封禅文、祝寿文、谢天文、上尊号玉册文、大赦文、德音文、铁券文、溢册文、哀册文等等，全是颂扬唐代帝室的。诸如此类，在当时都是所谓大手笔，編集在一起，可供士子或翰林学士之流“依样画葫芦”之用。

①圣德，是姚氏所分小类的名目。

但时移世易，今天看来，就都成了毫无价值的糟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文粹》收入陆龟蒙《江湖散人歌》、释皎然《古意》，未免“稍失别裁”^①。其实，这两篇倒有一些好处，《文粹》之失也在彼不在此。这是古今看法不同处，也是前人预料不到的。

清顾广圻《唐文粹跋》：“《文苑英华》屡引《川文粹》，而其间每为《文粹》不载之篇，疑不能明久之。顷读彭叔夏《辨证》第五卷名氏条，有云：‘近世眉山成午编《唐三百家名贤文粹》’，乃知《川文粹》指此。”这部《川文粹》，出现还在《英华》之前，姚氏选文以及确定书名，也许曾受到它的影响吧？

《唐文粹》，北宋即已有刻本^②，以后屡经摹印，明代尤多。现今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初编》元绶宋刻小字本，明晋藩本（又明刻小字本），顾广圻校刻大字本，许增校刻本，江苏书局本。

清嘉庆间，吴江郭麐仿宋陈仁子《文选补遗》之例，成《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有凡例七条。大要是：（一）姚书赋类搜采略备，不须增益；诗为专门之学，学者自能探索全集，也不须补，故《补遗》缺此二类。（二）姚氏分类琐细，《补遗》则不别子目。惟碑志序记中略以类相从，其余则以时代先后为次。

^①卷一百八十六。陆作，《文粹》只题《散文歌》；皎然作，《文粹》题为《效古》。
^②宋施昌言《唐文粹后序》称临安进士孟珙曾校刻《唐文粹》，序末题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宝元是宋仁宗的年号，孟刻本至迟在这一年就已经问世了。

(三)议、辩、箴、铭等类，所补无多，就合并成卷。(四)骈丽文也间登一二。(五)《补遗》意主搜罗幽隐，故对韩、柳大家也只酌补少数名篇，如《平淮西碑》、《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之类。(六)姚书无行状一门，《补遗》则补入一卷。此书有郭氏自刻本，又有许增刻本，江苏书局本，并附《唐文粹》之后。

《唐文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宋吕祖谦《宋文鉴》一百五十卷(清庄仲方又有《南宋文范》七十卷)，元苏天爵《元文类》七十卷，明程敏政《明文衡》九十八卷，黄宗羲《明文授读》六十二卷，清姚椿《国朝文录》一百卷，李祖陶《国朝文录续编》八十二卷等等，纷纷并作，大都是规仿姚氏的，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

獵古資源

五、《古文苑》

《古文苑》，相传是唐人旧藏本，北宋孙洙^①得于佛寺经笈中。所收诗、赋、杂文，自东周起，到南齐止，共二百六十多篇，都是史传和《文选》所不载的。南宋淳熙（孝宗年号）中，韩元吉^②编为九卷。绍定（理宗年号）时，章樵^③就韩书补遗刊误，又作注释，并重编为二十一卷。今两本并存，但章书较为流行。

章樵本，卷一是文^④，卷二至卷七是赋，卷八至卷九是诗歌，卷十至卷二十是杂文；卷二十一为附录，收入十几篇残缺不全的文章。文体共有二十类，其中赋、诗、箴三类所收篇数较多，其余各类则很少，有一些每类只收一篇（如敕、启、状、述、记等类）。章樵的注释，根据唐、宋类书所引，补遗刊误，做了不少工

①孙洙，字巨源，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少能文，年未二十即成进士。元丰（神宗年号）中，累官翰林学士。洙博闻强记，熟悉史事，文章也明畅典丽，时人以比贾谊。传见《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②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雍丘（今河南杞县）人。绍兴（高宗年号）间，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有《南涧甲乙稿》等。

③章樵，字升道，号峒庐，昌化（今杭州市）人。嘉定（宁宗年号）元年（公元1208年）进士，官终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县），事迹见《成化杭州府志》、《宋诗纪事》。

④有《石鼓文》、《诅楚文》等。

作，但有些地方也很有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指出：“……王融二诗题为谢朓，盖因附见朓集而误。又《文木赋》出《西京杂记》，乃吴均所为，见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不能辨别，则编录未为精核。至《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据所注姓名，驳其依托。钱曾《读书敏求记》则谓旧本但称官位，自樵增注，妄以其人实之，因启后人之疑。又如宋玉《钓赋》‘蜎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官绵’误作‘官锦’，皆传写之讹，而注复详为之解，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之，则注释亦不能无失”。^① 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

《古文苑》的来历不明，所收的汉魏诗文又多根据《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删节的本子；开卷第一篇的《石鼓文》，也与近本相同。因此，过去有些学者怀疑它是伪书。但是，就算是孙洙依托的吧，也是北宋时代就出现了，它所采辑的文章，更是北宋以前的人所作，在保存文献上有一定价值。所以前人对它相当重视，往往加以征引。唐以前人的别集，象王粲、王融等人的，后世都不传，也只是由于章樵注的引用，才保存了一些篇章^②。这也是一点好处。

章樵本出版后，屡经翻刻，越到后来错漏越多，清乾隆中，钱熙祚^③用韩元吉九卷本校勘一次，又遍检《艺文类聚》等书，查对出处，分篇注明；除本文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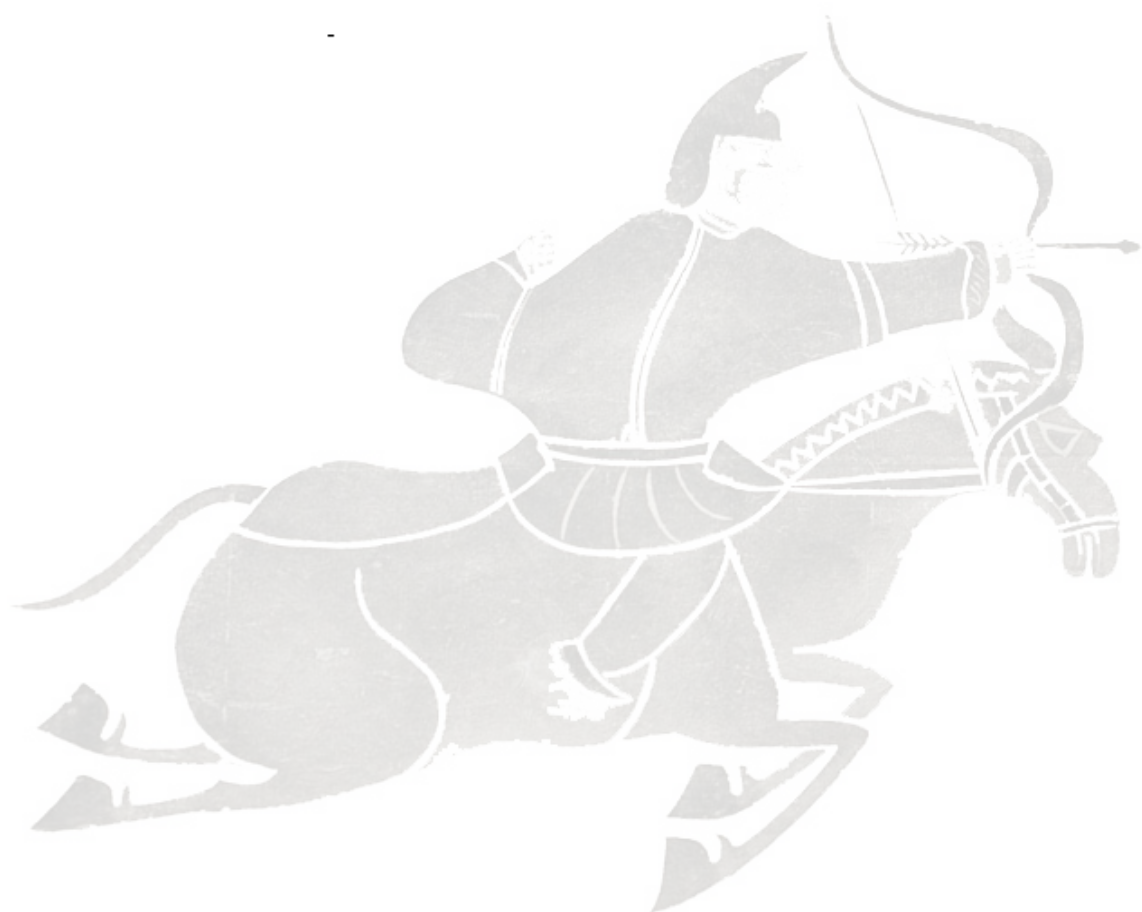
^①卷一百八十六《古文苑》条。 ^②王粲、王融等人的诗文，明代以后才有辑本。 ^③钱熙祚，字雪枝，一字锡之，清金山人，叙选通判，是清代有名的刻书家、校勘家。所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凡数百种，世称善本。

误没有他书可以核校的以外，其余都一一加以补正。成《校勘记》一卷，附所刻《守山阁丛书》本《古文苑》之后。

在钱氏校勘记成书后三十多年，孙星衍^①又辑金石、传记、地志和类书中的遗文，自周至元，以续《古文苑》，书名就叫《续古文苑》，凡二十卷。首有凡例十四条，主要的几条是：一、按文体分类，参用韩、章两本，又参考《文选》，另行编次。二、凡正史、《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以及各家专集《百三名家集》、《诗纪》等书已经收载，众所共见的，不再收入；所收的，汉魏六朝较多，隋唐以下逐渐减少，宋元则更少。三、《古文苑》已载的不收；但如蔡邕《述行赋》、王褒《僮约》之类，韩、章两本所收都残缺不全，或多错误，也变例加以采录。四、所载各文，都在目录下注明出处，金石各刻，则注拓本年月。又，所采诸书都据善本；有些由类书采出的，除据善本改正外，又参互考订，并加按语。有些原文有误或隐奥难知的，也加按语疏通证明。五、碑刻缺文，都计算字数，留有空白，以便日后刊补。从

①孙星衍（公元1757—1818年）字渊如，一字季仇，清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进士，累官至山东督粮道，归主钟山书院。少擅词章，深研经、史、小学，旁及诸子百家、碑板、金石。精校勘，喜刻书，有《芳茂山人文集》十二卷等。《续古文苑》始收钟鼎文字，首《宗周钟》，迄唐昭宗《赐钱王铁券》。这是孙氏的创例，以前的总集是没有的。

这些条文来看，这书体例的精善实远胜于《古文苑》旧本，但它没有注释，却又是不如章樵本的地方。



獵古資源

六、《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十二卷，清吴乘权及其侄大职编。乘权字楚材，大职字调侯，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事迹见本书吴兴祚序及《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吴序作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序里说：“今年春……，二子寄《古文观止》一编。”据此，可知这个选本至迟在这一年春天就已经编成了。

“观止”二字，出《左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见舞韶箛（即韶箫，也作箫韶，舜时乐曲名）者曰：‘观止矣。’”书名用这两字，意思是说，所选的都是尽善尽美的文章，没有比这些更好的了。

这书只收入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但却上起周代下迄明末，选录比较全面。就周代说，它以《左传》为重点，选了三十四篇，占总数六分之一以上。再加上《国语》、《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礼记·檀弓》的三十六篇，共七十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比重就更大。这是上溯散文的远源，所以多选了一些。汉代重《史记》而略《汉书》；唐代以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为重点，选了二十四篇，柳宗元也选了十一篇；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重点，共选入三十篇；这些都是

选得较多的。六朝只选六篇，元代完全未选。这些都是选得特别严的。总的看来，它能够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在选材上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此外，所选以散文为主，但也收入少量的骈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王勃《滕王阁序》等），韵文（如屈原《卜居》、宋玉《对楚王问》），使读者便于比较，便于辨认文体变化的迹象。选文有三四千字的大篇，也有一、二百字的小品，但更多的是千字左右的文章，极便诵读、记忆。如此之类，也是考虑得比较全面的。

这书选入的文章，有一些确实是比较好的。例如：周文的《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召公谏厉王止谤》、《王孙圉论楚宝》、《邹忌讽齐王纳谏》、《赵威后问齐使》、《鲁仲连义不帝秦》、《唐睢不辱使命》等篇，汉文的《过秦论》、《论贵粟疏》、《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篇，六朝文的《桃花源记》等篇，唐文的《师说》、《捕蛇者说》、《钴鉞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阿房宫赋》等篇，宋文的《岳阳楼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等篇，明文的《报刘一文书》、《五人墓碑记》等篇，都是流行广泛的名作。连同其他的一些思想性、艺术性也较好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略地反映我国散文发展的历史情况，而且体裁有传记、论说、抒情散文、应用杂文，以及游记、寓言小说等等，几乎应有尽有。也大致能够反映古代散文的丰富多采。在这方面，这个选本是比较可取的，应该予以肯定。

这书的体例，以时代为经，作家为纬，不按文体分类。这也是一种较好的编排方法。《文选》以后，一般的文章选本，大都继承萧统的传统，一直在分类上兜圈子，不但琐碎牵强，有时还把一个人的作品分散到几类，看起来很不方便。例如《文选》把班固的文章分列七类，《骈体文钞》把蔡邕的文章分列十一类，就是这种情况。南宋时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①。把传统的繁杂的分类大大地简化了一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分得太简，难免粗疏（如抒情散文就无类可归），也不足以反映古代散文的丰富性。《古文观止》打破了旧框框，不按文体分类，但选文却照顾到各种文体和多样的风格。这就把萧、真两种办法的缺点都避免了。全书按时代、作家编排，使人如读各家选集，这种好处也是按文体分类的选本所不可能有的。

《文章正宗》开始选入《左传》、《国语》等书，明代人论文，一派主张“文必秦汉”，另一派则推尊唐宋八大家^②。这些，对《古文观止》都有影响。调和秦汉、唐宋两派的桐城派早期作家方苞，对它也可能有一定影响^③。在这种多方面的影响下，《古文观止》就

①《文章正宗》正集二十卷，所选都是唐以前的文章，分四类（若除去诗歌，只有三类）。续集二十卷，则是宋代的文章，只分叙事、议论二类。 ②主张“文必秦汉”的是前后七子；推尊唐宋的有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人。 ③方苞论文，在很多地方，都与《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相合，可参看王忠《论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国文月刊》七十六期）。

能够不囿于一家一派，相当广泛地选了一些名篇，体现了韩愈以来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开拓了八股文盛行时期一般读者的眼界。就这一点说，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加上它本身又具有上述的一些优点，因之刊行以后，它一直受到欢迎，成为最流行的初学古文读本。后来，许多古文选本（如《古文析义》、《古文释义》之类）虽然不断出版，但始终不能代替它。因此，鲁迅先生曾一再拿它和《文选》并称，并说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一样地不可轻视^①。这是正确的看法。过去的文人学者之流，重视《文选》而看不起《古文观止》，只是一偏之见，是并不公允的。

《古文观止》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主要是：一、它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书里充满了封建的毒素，这从选文和评语两方面都可以看出。选文中，有一些大肆宣扬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②；有一些宣扬天命，天道^③；有一些则宣扬“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④；另外，还有宣传道统、乐天知命，以及隐逸生活的^⑤。都是一些要不得的东西。评语，如《原道》、《赠黎安二生序》、《象祠记》等篇后编者所评，都大谈

① 参看《题未定草六》（《且介亭杂文二集》）、《选本》（《集外集》）。

② 这类文章，前三卷就很多，如《石碣谏宠州吁》、《襄王不许请隧》、《晋献公杀世子申生》等。③ 如《王孙满对楚子》、《单子知陈必亡》等。④ 如《敬姜论劳逸》、《梓人传》等。⑤ 宣传道统的，如《原道》、《尊经阁记》等；宣传乐天知命的，如《春夜宴桃李园序》、《上梅宣讲书》等；宣传隐逸生活的，如《北山移文》、《送李愿归盘谷序》、《放鹤亭记》等。

所谓“名教”，卫道的气味也很重。封建时代的选本，大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个选本当然也不例外。

二、选文去取不够恰当。尽管这书选录了一些好文章，但还是非常不够。从今天看来，许多有进步意义的文章都未收入，收入的有一些也不是作者的代表作。例如：韩愈文不选《张中丞传后序》、《与李翱书》、《祭柳子厚文》等，却选了摇尾乞怜、丑态毕露的《上宰相书》（二篇），以及《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归有光文，不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等较有特色之作，却选了《吴山图记》、《沧浪亭记》；如此之类，都是选择不当。更严重的是，还收入了一些伪作，如李陵《答苏武书》、诸葛亮《后出师表》、苏洵《辨奸论》等^①；特别是李、苏二文，或为民族叛徒辩护，或污蔑当时杰出的政治家，都是不足取的。

三、八股的气息很重。吴乘权本来是一个八股先生^②，他的这个选本是为了有助于学习八股文而编的，选文、评注都从这一要求出发，正同上文提到的《古文析义》、《古文释义》之类是一样的。《古文析义》的《凡例》说，凡是不甚切于“制艺”（就是八股文）的，就少登录。《古文释义》的《凡例》也说：“初学读古

①《答苏武书》，唐刘知几《史通·杂说》已经指出是伪作，《文选》也误收。《后出师表》，《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只见于裴松之注。《辨奸论》是污蔑王安石的伪作，辨详清李绂《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②吴兴祚《古文观止序》：“楚材……工举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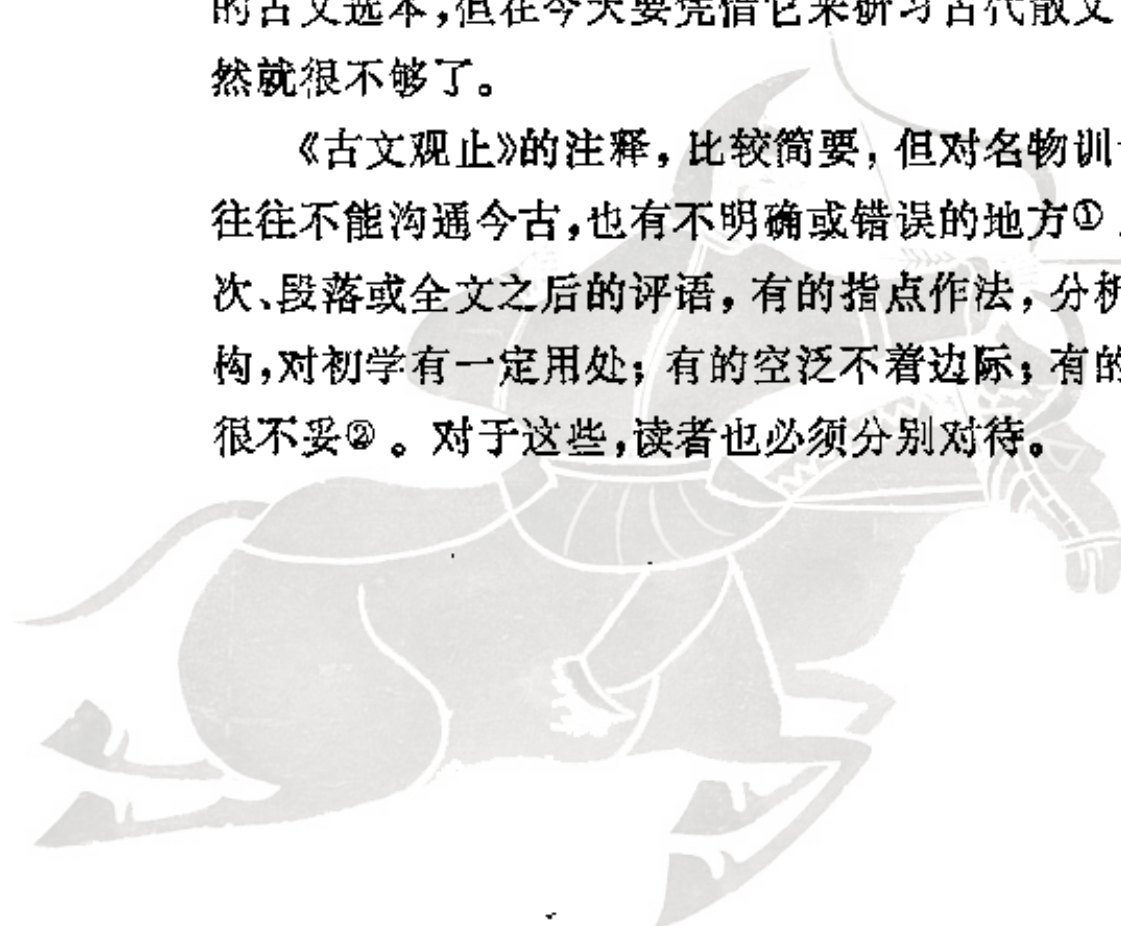
文，率多为裨益‘时文’（也就是八股文）起见，是编固非有裨“举业”（也指八股文）者不录。”这些话，其实也就是《古文观止》选材的标准。书中评注，如在《阴怡孙对秦伯》里，就大谈什么“整对格”，什么“反正开合”；在《喜雨亭记》里，就大谈什么“分合倒顺虚实”。诸如此类，都是八股先生的见识。用这一套来评论文章，必然流于支离破碎，读者要是误信的话，也是必然会迷入歧途的。

四、因人成事，沿用旧选本的居多。最古的文章选本，如《文选》等，大都直接从许多别集中选录文章。后来的选本，虽然间有从总集采取的，但如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汤汉《妙绝古今》、王霆震《古文集成》、谢枋得《文章轨范》之类，都能各出手眼，有自己的精神面目。《古文观止》却不是这样。它的《例言》说：“古文选本如林，面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教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这里有许多托词，真正的原因是：贪图省力，容易成书。它所依据的一些选本，看来最主要的是《古文渊鉴》。原来在一六八五年（即《古文观止》编成前十年），康熙曾以自己的名义编选了一部《古文渊鉴》，选文从《左传》起一直到宋代，每篇有评有注。《古文观止》所选的文章，绝大部分都可以在这部书里找到，编排的方法也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明代的十六篇而已。《古文渊鉴》有六十四卷，是官书，

不易购求，流行不广。《古文观止》的编者把它精简了一些，并未花过多的功夫，就自成一书了。但沿袭之迹，还是清楚地可以看出来的。

总之，《古文观止》在过去不失为一个比较合用的古文选本，但在今天要凭借它来研习古代散文，显然就很不够了。

《古文观止》的注释，比较简要，但对名物训诂，往往不能沟通今古，也有不明确或错误的地方^①。层次、段落或全文之后的评语，有的指点作法，分析结构，对初学有一定用处；有的空泛不着边际；有的则很不妥^②。对于这些，读者也必须分别对待。



獵古資源

①如《北山移文》“鹤书赴陇”句注，说诏书象鹤头，其实是诏书所用的字体（鹤头书）象鹤头。这是不明确之例。又如《阿房宫赋》“缦立远视”句注，说“缦，宽心也。”其实“缦立”就是徘徊久立。这是错误之例。②如《辨奸论》等文的评语。

七、《全唐诗》

《全唐诗》是一部收采最富的唐人诗歌总集，共九百卷（另有总目十二卷），收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

这部大书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春夏间开始刊刻的。当时，曾在扬州天宁寺专门设立了全唐诗书局，由通政使曹寅^①任校阅刊刻官，侍讲彭定求、编修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璩、庶吉士俞梅等十人^②任校对官，次年秋成书，历时约一年半。

此书卷首列有校阅刊刻和校对人员姓名，即上述的曹寅、彭定求等十一人。又有《进书表》，也是十一人署名。但书中始终未提编辑人是谁，这是由于另有缘故。

康熙帝在这书的序文里说：“朕兹发内府所有全

^①曹寅（公元1658—1712年），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原籍丰润（今河北丰润）。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工诗，亦善词曲，著有《楝亭诗钞》、《词钞》等。寅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②彭定求等十人也大多是诗人，当时有“十翰林”之称。

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搜补缺遗，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时代，分置次第。”又，这书有《凡例》二十一条，其中的第十条说：“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第十八条说：“全唐诗集，或分体，或分类，或编年，止缘唐人撰集及宋人校刻，体例不一，当时缮写悉依所见本集，今仍照全唐写本。其太冗杂者，略为詮次，不必更张。”又《进书表》中也说：“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等校对，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在曹寅等校刻之前，清内府中已经有了一部全唐诗的写本。但这个写本的来历，曹寅等却没有交代清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唐诗提要》：“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御定^①。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是编禀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搜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这里所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明白指出今本《全唐诗》是以《唐音统签》为稿本，并用

^①同卷《全唐诗录提要》则说：“盖《全唐诗》编纂成书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这两说，一指确定编辑体例言，一指校刻完成言，并不矛盾。《全唐诗录》一百卷，清徐倬编。

内府所藏全唐诗集以及其他文献来补充，说得比康熙帝的序文更为确切；二是这书在康熙四十二年就已经编定了，而且是“稟承圣训”编的，这就解释了曹寅等所以未提编辑人的原因^①。

《全唐诗》的蓝本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震亨字孝辕，号遯叟，又号赤城（一作赤城山人），浙江海盐县人。明神宗万历丁酉（公元1597年）举人，官至兵部员外郎。著有《李杜诗通》、《海盐县图经》，而以《统签》为最有名。事迹见《海盐县续图经·人物篇》。《唐音统签》汇集李唐三百年诗为一编，以十干为序，由《甲签》到《癸签》，共十集，一千零二十九卷^②。震亨从少年时期起就搜辑唐诗，差不多用了毕生之力，所以网罗繁富，卷帙特多。生前无力刊行，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才由其子孙相继校刻了《戊签》。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8年），江宁书肆又刻了《癸签》。过去，一般认为十集之中有刊本的只此二集。但据故宫旧藏，甲、乙两集也曾刻印过，其余各集则全是抄本^③。总计已刻的四集，卷数约占

①今人周汝昌疑刊刻《全唐诗》出于曹寅的倡议（见所著《红楼梦新证》上），然无确证。②《唐音统签》卷数，各家著录不一。《明史·艺文志》作一千二十四卷，《千顷堂书目》作一千三十二卷，大抵皆据传抄。故宫博物院所藏足本为一千三十三卷（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一期），然经核计，实一千二十九卷。③《唐音统签》刊、抄的情况，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六《唐音癸签》条、朱家潜《足本〈唐音癸签〉全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一期）。据朱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足本，系范希仁抄补。希仁亦海盐人。有人认为《唐音统签》丙、丁、己、庚各集亦有刊本。

全书的三分之一。自《全唐诗》盛行之后，除《癸签》因收录了大量的研究唐诗的参考资料依旧流传以外，其余各集则若存若亡，渐不为人所知。但《全唐诗》既以《唐音统签》为蓝本，则《唐音统签》实已包含在《全唐诗》中，胡氏的搜辑之功也就并未埋没了。

胡震亨之外，明代留心收集唐诗的还大有人在。冒襄在《影梅庵忆语》里说：

会数年来，欲裒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每集细加评选，广搜遗逸，成一代大观。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无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见者甚夥。《品汇》①六百家，大略耳。即《纪事本末》②千余家，名姓稍存而诗不具。《全唐诗话》③更觉寥寥。兰隅先生序十二唐人，④称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余种。孟津王师向余言：买灵宝许氏全唐诗，数车满载，即曩流寓官胡孝辕职方批阅唐人诗，剞劂工费需数千金。僻地无书可借，近复裹足牖下，不能出游购之。以此经营搜索，殊费功力。然每得一帙，必细加丹黄；他书有涉此集者，皆录首简，付姬收贮⑤。

据此，可以推知：一、今本《全唐诗》刊刻之前，收

①指明高棅《唐诗品汇》。②指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③《全唐诗话》三卷（近代刻本或作十卷，或作三卷），旧题宋尤袤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定为贾似道门客廖莹中抄窃《唐诗纪事》而成。④兰隅，一本作芝隅，明朱之蕃号。之蕃，字元价，金陵人，万历乙未状元，官终吏部右侍郎。刻有《中唐十二家、晚唐十二家诗》。⑤姬：指董小宛。

藏大宗唐诗的有胡震亨、冒襄、豫章大家、灵宝许氏、孟津王氏等几家。除胡氏已经编辑成书外，冒氏也做了收购、分类、编次、校勘等一系列的工作，不过由于缺遗尚多，还未写定罢了。二、灵宝许氏和孟津王氏所藏大概就是胡氏编《唐音统签》时依据的原本。三、明、清之际传抄的唐人诗集数量很多，所以光是中、晚唐就已有七百余种。

此外，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①的《唐诗》。原来季氏曾得到当时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②的残稿，加工纂辑，费时十年，终于编成一部七百七十卷的大书，即《唐诗》，也即曹寅等所说的“全唐诗”或“全唐诗集”。编成之后，仅有抄本，后为康熙购得^③。据近人考证知钱稿又据明吴琯《唐诗纪》^④，加以剪编粘补，间有批订。吴书成于众手，基础本好；钱、季对唐诗又精于品鉴，踵事增华，质量更高。曹寅等有此凭借，又得《唐音统签》之助，所以才

①季振宜(公元1630—?年)，清泰兴(今江苏泰兴)人，字说兮，号沧苇。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进士，官至御史。好藏书，所藏宋、元版及精本甚多。有《季沧苇书目》(一名《延令宋版书目》)、《静思堂诗稿》。

②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清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后降清，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工诗文，有《初学集》、《有学集》。

③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曾记康熙四十四年购求《全唐诗》的事。

④琯，明漳浦(今福建漳浦)人，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进士。尝校刊冯惟讷《古诗纪》，因仿其例成此书。《初唐诗纪》六十卷，《盛唐诗纪》一百十卷甫竣，即先刊行，尚非完帙。同时纂辑者有黄德水、陆弼、谢肇、俞体初、俞策诸人。有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琯自刻本。

能在短暂的一年半之内，成书九百卷。但因钱谦益是贰臣，声名不好，季氏则对他颇为推崇，所以康熙在《御制全唐诗序》中只提《唐音统签》，而只字不及季氏。这样，曹寅等自然也就不敢触及了。这就是《全唐诗》对它的来历所以隐约其词的原因。用故宫图书馆所藏抄本核对，知曹寅等修书时实以季书为主要底本，而以《唐音统签》辅之。大概说来，初、盛唐全据季书，中、晚唐则多采《唐音统签》^①。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还应指出，曹寅也是一个收藏、研究唐诗的专家。他曾购得徐乾学旧藏宋版唐诗数十家^②，又“浏览全唐诗派，多师以为师”。^③可见校刊《全唐诗》时一定也参考了自己的藏本。他喜欢刻书，所刻如《韵书五种》、《楝亭十二种》等，世称善本。他对《全唐诗》耗费的心力尤多，写刻都十分精好，在雕版史上也是一部杰作。

如所周知，唐朝是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当时以进士科取士，诗是必考的科目之一，作诗成为猎取

① 详见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文史》第八辑，1980年3月出版）。② 见徐用仪《圭美堂集》卷二十。③ 朱彝尊称赞曹寅的话，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九·《楝亭诗序》。又，曹寅《书院述事三十韵答同人见投之作兼寄前诗局诸君及汇南、于宫、绮园》诗也说：“搜罗极杳冥，剔剥屏解诂”（《楝亭诗钞》卷八），可与朱诗互证。但朱氏对《全唐诗》实有不满，有“业经进呈，成事不说”的慨叹，见《晨风阁丛书·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甫跋。

禄利的正路，因之文人几乎无一不能作诗。作者既多，篇章自然不少。在这大量的诗篇中，尽管也有许多不好的和很坏的，但总的说来，一般能够广泛而深刻地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实在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对于这份珍贵遗产，加以搜罗、整理和校勘，汇为一编，使学者得以周览遍观，左右采获，是一大方便，也是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全唐诗》搜集者和校刻者的这一功绩。

《全唐诗》的二十一条凡例^①写得相当杂乱，就有关编排方面的条文来看，它的体例，可简述如下：

（一）不用初、盛、中、晚的传统分法^②，作者全按时代为次。（其中帝室略依唐史序例^③；有科第可考的，以登第之年为主；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的，以入仕之年为主；处士以卒年为主；卒年如无可考，则就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如此之类，又有分别。）

（二）唐代诗人有正集的，各自成卷；诗少不能成卷，或另编，或附入他人集内。（如崔涤、崔液附崔湜，王勣附王勃之类，并附入集后。）

（三）每集之前，各有诗人小传。

（四）无爵里世次可考的，另编。

①此外又有“词凡例”，只二条。 ②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始于宋严羽《沧浪诗话》，定于明高棅《唐诗品汇》。这种分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按：季振宜书不分初、盛、中、晚。 ③南唐、吴越、闽、蜀诸国主，附诸王之后。

(五) 释、道、外国、名媛、仙、鬼诗以及联句、杂类，也各另编。

(六) 郊庙乐章及乐府歌诗分载各集的，汇编为一集；但唐人新乐府则仍各载本集。

(七) 词(长短句)，另编。

此外，间有校注，考订字句异同及篇章互见等情况。

《全唐诗》的最大优点就是比较“全”。就编者说，要做到全，极不容易；就读者说，却是越全越有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另有两点也值得提出：

一是其中有不少作品对考史很有补益。尽管这是作品本身提供的，但编者把这些诗都收采了来，就为研究者带来极大方便。刘师培说：

《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如杨炯《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言刘延嗣官润州为徐敬业所执也；岑参《孺姬墓下》诗，言武惠妃之事也。高适《辟阳城》诗、祖咏《古意》诗、李嶷《读〈前汉书·外戚传〉》，均讥杨妃之宠，兼刺玄宗之色荒。白居易《思子台有感》、郑还古《望思台》、许浑《读〈戾太子传〉》、温庭筠《四皓》诗，均刺文宗之废立，兼悼太子之沉冤。自此以外，则权德舆《读谷梁》之作，指李怀光之事言。吴融《无题》之什，指韦保衡之事言。而戎昱《苦哉行》则又伤回纥之横暴，感时抚事，情见乎词。推之李华《咏史》、王翰《飞燕篇》，均指陈宫闱之失，敷陈往事，以寄讽谏之忧。

罗隐《咏史》诗、韩偓《有感》诗、《观斗鸡》诗，均历指邪臣之非，比物兴怀，以写离忧之思。汇而观之，可以考见唐代之秘史矣。其足以考证人物者，其证尤多。如岑参《送许拾遗思归江南拜亲》诗，许拾遗者，即杜少陵诗中所谓许八拾遗也。李渥有《秋日登越王楼献于中丞》诗，李渥者，即《唐摭言》所记之李渥也。此亦《全唐诗》有补于考史之征①。

岑仲勉也说：《全唐诗》有可以补史阙的，如沈佺期《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并序》，记裴怀古曾为潭府都督，而两唐书均未载②。有可以纠史误的，如崔湜《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诗，实较《旧唐书》作长乐公主为确③。有可以考史文的，如万齐融下注谓“神龙中，贺知章与贺朝万、齐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辞俊秀，名扬于上京”，而唐人所选《国秀》、《搜玉》二集均作贺朝、万齐融④。如此之类，当然也都可以供读史者的参证。

刘、岑二氏所举，都是比较隐晦和细微的，至于李、杜、元、白等人的诗，其中更有许多与史事明显有关。这是人所尽知的，可以不消举例了。

另一是曹寅等校刻时也做了一些考辨、删削、补逸之类的工作。如唐高祖《赐秦王》诗，见于《册府元

①《左食外集》卷十三《读〈全唐诗〉发微》。按：刘氏此文有注颇详，今略去。 ②《读〈全唐诗〉札记》，见《唐人行第录》。 ③同上。唐中宗女无长乐，而长宁西京甲第之盛是有名的，故知乐字必误。 ④同上。

龟》，诗中有“五宿连珠见”的话，而唐初实无五星联聚之事，显系伪托^①。又如旧本误认六朝人诗为唐诗（如杨慎即陈阳慎、沈炯即陈沈炯之类），或误认诗题里的字为作者姓名（如上官仪集中《高密公主挽词》，误作高密诗之类），或误认诗题里提到的人为作者姓名（如王维集中《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误作慕容承诗之类）。如此之类，《全唐诗》都作了辨正。这是考辨的例。又如《唐音统签》把道士的章咒、和尚的偈颂都收录进来，多至二十八卷。但这些东西实在不能算作诗，《全唐诗》一概汰去。这是删削的例。又如各家集外逸诗，有见于他书的，有刻于碑版的，《全唐诗》也都旁加搜采，计补诗七卷，词十二卷，作家一百八十三人（内诗人一百一十五人）。这是补逸的例。另外，《全唐诗》还有校注，这在上文已经提到了。

但是，必须指出，《全唐诗》的这些工作做得都是很不够的。

即如补逸方面，日本天明中，上毛河世宁^②就已收罗旧籍，兼采《千载佳句》、《文镜秘府论》等书，成《全唐诗逸》三卷，补了一百二十多家的诗，鲍氏刻入

^①这是根据胡震亨的说法，见《凡例》。以下所举的一些例子，也见《凡例》。^②天明，光格天皇年号，共八年，当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公元1781—1788年）。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字子静，号半江，上毛野国人，为昌平学都讲，著有《日本诗纪》五十卷。

《知不足斋丛书》中^①。近人王重民撰《补全唐诗》^②，据敦煌所出古典文学作品，与《全唐诗》勘校，补诗九十七首，又残缺的三首，附录的四首，共一百零四首。作者五十人，其中有十九人《全唐诗》未载。又，近人孙望撰《全唐诗补逸》二十卷^③，在《全唐诗逸》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共收诗八百三十首，残句八十六句，作者二百四十二人。所辑较为完备，但仍有遗漏，还需续加增补。由此可见，唐诗散佚的极多，《全唐诗》所补是非常有限的。

又如考辨方面，后人也举出大量的例证说明《全唐诗》舛误很多。现择比较典型的分项胪列并略加说明如下：

（一）误收 如：

唐太宗《饯中书侍郎来济》诗，注云：“一作宋之问诗，非。”（卷一）^④但宋之问集又收此诗，注云：“一作太宗诗。”（卷五十二）按：此诗既非太宗作，亦非之问作，实高宗诗^⑤。

①《知不足斋丛书》本《全唐诗逸》，卷上收诗二十三首，残句二百五十四句，作者四十五人；卷中收诗十三首，残句二百七十八句，作者七十九人；卷下收元名氏诗十三首，张文成（鷟）《游仙窟》诗十九首（从旧本七十八首中选出）。李峤《杂咏》诗六首（补《全唐诗》缺文）。有天明八年淡海竺常序，道光三年翁广平跋。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也附入此书。 ②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63年5月。 ③《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选刊其中的一部分，并附作者《自序》及《后记》。又，中华书局近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的逸诗，合为《全唐诗外编》，凡二册。 ④辨详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见《唐人行第录》。 ⑤据刘师培考证，见所作《读全唐诗书后》（《左盦集》卷八），又《读全唐诗发微》（《左盦外集》卷十三）。

薛涛《十离》诗(卷八百三),据《唐摭言》,实元稹幕客薛书记作,非涛诗①。

白居易《东城桂》第三首(卷四百四十七),与古乐府相同,只有首句“遥知”作“可怜”,稍异②。

这些,都是不应归入某一作者名下的,却错误地收录了。这一类的例子很多。

(二) 重出 如:

张九龄《晚霁登王六东阁》诗(卷四十八),与严维诗(卷八百八十三)相同③。

王维《寄河上段十六》诗(卷一百二十八),与卢象诗(卷一百二十二)相同④。

无可《哭张籍司业》诗(卷八百十四),与张乔诗(卷六百三十九,但题作《哭陈陶》)相同⑤。

唐诗多出宋以后人收辑,常有一诗而互见于两集的,如李商隐《定子》诗又见《杜牧外集》,《游灵伽寺》诗又见许浑《丁卯集》之类是。《全唐诗》对一诗互见的,一般加注说明,如李峰《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注云:“一作李岑诗。”朱彬《丹阳作》,注云:“一作陈存诗。”这种做法本来很好,但可惜未能贯彻,因而有许多处都未注明,这是辑者的疏失。

(三) 注释错误 如:

李绅《欲到西陵寄王行周》诗(卷四百八十三):“西陵沙岸回流急。”注云:“钱王以陵非吉语,改名西

①见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 ②③④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 ⑤见《读全唐诗书后》。

兴。”按：李绅死于公元846年，钱镠建立吴越国则在907年，相距六十一年，《全唐诗》显然是把后人的注释当做作者自注了^①。

刘长卿《送郑说之歙州谒薛侍郎》诗（卷一百四十八），注云：“一作薛能郎中。”按：刘长卿是唐玄宗时人，薛能则仕于懿宗、僖宗时，两人时代不相及。此注也是错误的^②。

这一类也很不少。

（四）小传疏舛 如：

陆海小传（卷一百二十四）云：“余庆之孙，有才思，与陈子昂、卢藏用为方外十友，工于五言。”又云：“陆海，一作孙海。”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二陆海条：“陆余庆与陈子昂、卢藏用为方外十友。孙海，工于五言。”又，藏用《陈子昂别传》亦云：“友人赵贞固、凤阁舍人陆余庆。”据此，知与子昂、藏用为友的是陆余庆，不是他的孙子陆海。小传的作者误读《唐诗纪事》，把祖父的朋友当成孙子的朋友了。又把“孙海”的孙字当成姓，这是尤其错误的^③。

刘湾小传（卷一百九十六）云：“字灵源，西蜀人。”按元结《次山集》卷七《别王佐卿序》，《唐诗纪事》卷二十五及林宝《元和姓纂》都说湾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小传作者大概误认彭城为彭州（今四川新都县境），所以就说是“西蜀人”了^④。

^①见《读全唐诗书后》。^{②③④}见《读全唐诗札记》（《唐人行第录》217页）。

诗总集兼有小传的，自唐姚合《极玄集》创始^①。《全唐诗·凡例》说：“诗前小传，但略序其人历官始末，至于生平大节，自有史传，不必冗录。”这种办法本来无可非议，但有些诗人并非无世次爵里可考，也不是只有爵里、没有世次^②，《全唐诗》或一字不提，或叙述极简，这就未免失之漏略。又，有些诗人的生卒、年寿，后人参稽旧籍，多已考出^③；小传则或含糊其词，或绝未涉及，这也说明当时并未深考。

《全唐诗·凡例》说：“（唐人）诗集有善本可校者，详加校定；如善本难觅，仍照《全唐》、《统笈》旧本，以俟考正。”但书中错字实在太多，诗、题、序、注里都有，简直不胜枚举。不过，比起上述四项来，毕竟是次要的，这里就不多说了^④。

又如删削方面，《全唐诗·凡例》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九等条，都曾提到对旧本有所删正^⑤，但实剔除未尽。例如令狐绹《登望京楼赋》（卷五百六十三），实其父令狐楚诗，应移收于卷三百三十四内。绹更无其他的诗，连名字都应删去^⑥。又如陈

①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极玄集》条。按：姚合所作小传较简，其源又出于宋王俭《七志》。②岑仲勉已考出数十人，见《唐人行第录》。③如徐坚、孟浩然、独孤及、杜牧、李商隐等人。可参看钱大昕《疑年录》、余嘉锡《疑年录稽疑》。④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读全唐诗书后》、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各举了一些例，可参看。⑤其中第十五条指出道、释二家的章、咒、偈、颂应删，上文已引。又，《词凡例》的两条，也都谈到“删削”。⑥《唐人行第录》262—263页。

孙《移耶溪旧居呈陈元初校书》诗（卷二百五十八），是秦系作，《全唐诗》已收入（同卷），陈孙则并无其人^①。又如韩雄《敕和元相公家园即事寄王相公》诗（卷七百七十），是韩翃作（卷二百四十四），“雄”是误字，也并无韩雄其人^②。如此之类，都应删汰，但《全唐诗》却未能明辨，统统保留下来了。

此外，《全唐诗》的体例，也有一些可议的地方。这里举出三点：

其一，附入五代诗并不是好办法。李调元说得好：

窃尝论之，梁、唐、晋、汉、周历五代十三君，共五十二年。其间或缙绅，或隐逸，代不乏人。然各事其主，判若町畦。如梁初或可附之唐末矣，晋、汉、周则去唐较远；周末或可附之宋初矣，唐、晋、汉则距宋稍远；况兼以十国各据疆土，即五代之君亦不能隶其版土而属之，而况乎唐、宋？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以之附入，岂不谬哉^③！

李氏辑《全五代诗》一百卷（又补遗一卷），将五代诗人选家附入唐末、宋初者一一归还某代，并将十国附于五代之后。这样的处理确比《全唐诗》合理。

其二，日本人晁衡、新罗公主金真德等外国人的

①《唐人行第录》，225页。陈元初，“元”应作允。 ②《唐人行第录》271页。韩翃诗，文字小有异同。 ③见王昶《湖海文传》卷三十一。

诗,《全唐诗》也收了进来,杂置于唐诗人之列。孙望《全唐诗补逸》则把外国人与唐人有交往酬唱的,各自编集成卷,用“友邦”标目,附于编末。体例也较《全唐诗》为好。

其三,唐代僧人多能诗,道士也间有佳作,《全唐诗》收入僧(寒山以下)、道(司马承祯以下)诗,原无可非议。但二家之外,又收仙(吕岩以下)、鬼(慕容垂以下)、怪(浑家门客以下)、梦(肃宗以下)等诗,那就未免贪多务博、荒诞不经了。不过,这不只是体例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辑者的见识。

有人认为《全唐诗》收录了词(长短句),也是体例不纯。其实,这倒可以解释。词本来是广义的诗,作为一种新体,到中晚唐才开始逐渐定型,初期的词与诗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唐代的词数量也不多,因此,《全唐诗》兼收长短句,还是可以的。五代、北宋以后,词已蔚为大国,情况显然两样,那就不能援《全唐诗》为例了。

《全唐诗》的版本很不少,比较通行的有扬州诗局本、江宁重刻本、广州巾箱本、抚州重刻小字本。1960年和197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末附作者索引,最便检查。1979年新版的《点校说明》列举了不少例证,指出《全唐诗》的舛误,也可供参考。

八、《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六卷(一作八卷),清蘅塘退士编。蘅塘退士,今人考定为孙洙。洙(公元1711—1778年),江苏无锡人,字临(一作苓)西,号蘅塘,晚号退士。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进士,历官大城、卢龙、邹平知县,改江宁教授。有《蘅塘漫稿》、《排闷录》等。事迹见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等书。他擅长诗歌和书法,选辑《唐诗三百首》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所以这个著名的选本实际上是他们夫妇合编的。

《唐诗三百首》成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①,二百多年来,流传极广。过去有人做过统计,唐诗总集共一百二十七种(实尚不止),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以此书为第一。解放以后,也有人做过统计,仅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各地出版社重印此书,总印数就达到七十多万册。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文学总集中也是很突出的。

书中选录唐代七十五个作家(无名氏二人在外)

^①有一种本子,题乾隆癸未,则是1763年。

的诗共三百二十首^①。说“三百首”，是举成数。这书的《题辞》曾引谚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书名即由此而来。有人说，编者选辑这书，有模仿《诗经》的意味，因为《诗经》也是三百篇。这是推测之词，恐怕未必合乎原意。

这书的原刻本，目前已经不易得到。翻刻本很多，所收的诗较原本也略有增删^②。书中选录的三百多首诗是分体编排的，计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其中古体约占三分之一，近体约占三分之二。

《唐诗三百首》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大约由于下面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选入的大多是唐代的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有一定的代表性。《全唐诗》收入作家二千二百多人，作品四万八千多首。从这里面只选出七十多家，三百多首，而又要求比较准确，比较公允，应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唐诗三百首》在这方面做得是相当好的。凡是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这个选本里都占有一定的篇幅，而地位越是重要的，入选的也就越多。例如杜甫诗收三十首，约占总数十分之一；王维诗收二十九首，李白诗收二十七首，所占比重也很大。此外，李商隐

①一作三百一十首。 ②如章燮本有三百二十一首，四藤吟社本有三百一十三首，今本有三百一十七首。首数所以不同，就是由于有增有删。

选二十二首，孟浩然、韦应物、杜牧各选十多首。这样的比例，虽然未必完全适当，但它突出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又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这中间是有一番斟酌的。就个别作家说，《唐诗三百首》也能注意到各取所长。例如李白多收其五、七古和乐府，韦应物多收其五古，王昌龄多收其七绝，李颀多收其七言歌行，就都选择得恰好。正因为《唐诗三百首》考虑了这些方面，所以它选的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

第二，眼界比较宽广，能够照顾全面。历代的唐诗选本，往往囿于宗派或偏好，缺少全面的观点；《唐诗三百首》则较少这种缺点。例如书中突出盛唐，选录较多（五古、七古、七言乐府，盛唐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五律、七律、五绝，盛唐各占百分之四十以上；七绝也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但同时也适当选入初唐、中唐和晚唐的诗，中、晚唐的近体还选得比盛唐多一些。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态度也比较公允。又如书中所收固然绝大多数是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但有些作家，声名并不十分显赫，而其作品却是很突出的，也往往加以选录。象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崔颢的《黄鹤楼》，陈陶《陇西行》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又如有些诗人兼有各种风格，《唐诗三百首》大都兼收并采，并不偏废。象王维的诗，既选了他的不少的田园山水诗，也选了他的《老将行》和《洛阳女儿行》。这就见出王维的风格在幽闲恬静之外，还有

雄健、清丽两个方面。又象李商隐的诗，既选了他的《无题》，也选了他的《韩碑》。这就见出李商隐的风格，除了风华绮丽的一面以外，还有雄浑苍劲的一面。这样的处理，可使读者接触更多的方面，认识更多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好处。

第三，还能适当注意作品的通俗易解，便于吟诵。《唐诗三百首》的《题辞》曾经说明它是“家塾课本”，是要读者“童而习之”的。因此，它有意照顾初学的人，使他们在开始接触唐诗时不致遇到过多的阻力。这又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诘屈难读的不选或少选。如韩愈尽管是大作家，但他的诗大都是“横空盘硬语”的，书中就只选四首，其中《山石》一首，还是比较好读的。至于李贺、卢仝等人，诗风较为奇险，那就干脆一首不选了。另一方面是容易上口的，就尽可能多选。这从五、七言绝句中最容易看出。五绝如孟浩然《春晓》，王建《新嫁娘》，张枯《宫词》，贾岛《寻隐者不遇》，金昌绪《春怨》，李白《静夜思》等；七绝如贺知章《回乡偶书》，王翰《凉州词》，岑参《逢入京使》，刘禹锡《乌衣巷》等，尽管思想内容有不同，但都明白如话，人人能解。过去万口流传的，也往往就是这类的诗。《唐诗三百首》选诗既比一般选本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又较为通俗，因而就易于记忆，易于传播。它所以能广泛流行，为大家所熟悉，同这一点是很有关系的。

当然，从现在看来，《唐诗三百首》还存在着许多

严重的缺点，它也象其它的一些选本一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了。

以下也只举几项主要的说一说。

偏重艺术性，忽视思想性，是第一个缺点。《唐诗三百首》所选的诗，思想内容较好的，如李颀《古从军行》，高适《燕歌行》，沈佺期《杂诗》、《独不见》，李白《关山月》、《子夜吴歌》，杜甫《兵车行》、《丽人行》，陈陶《陇西行》等，只有三十多首，仅占总数百分之十，可见书中所收的唐诗精华并不多。有些现实主义的名篇，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奉先咏怀》，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以及元结的《春陵行》、张籍、王建的乐府等等，它都一概未收。相反，一些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功德（如王维，岑参等人的应制诗）和腐朽生活（如薛逢、顾况等人的宫词）的诗，甚至连封建皇帝自己写的东西（如唐玄宗李隆基的《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倒都选进来了。此外，书中还有不少歌颂隐士生活的田园山水诗（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等人的部分作品），提倡逃避现实的颓废诗（如王、孟、李及韩愈、李商隐等人的部分作品），以及描写无聊生活的香艳诗（如李商隐《春雨》、《为有》，韩偓《已凉》，杜牧《赠别》、《遣怀》等），思想感情都是不健康的，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坏。这些糟粕居然全被采入，正是编者偏重艺术性，忽视思想性的具体表现。

取材的范围仍然不够广，是第二个缺点。《唐诗

三百首》虽然注意到照顾全面，但所收仅仅限于文人的作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诗歌创作则是根本忽视的^①。近人曾以敦煌写本所录唐诗为例，说明孙洙遗漏的还很不少。但写本是后来才发现的，《唐诗三百首》未及采辑，还不足怪。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见于正史及《乐府诗集》等书的唐代民间作品，并不难找，而孙洙也未加以搜集。如永淳初（约公元682年）童谣：“新禾不入箱，新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②乾符六年（公元879年）童谣：“八月无霜塞草青，将军骑马出空城；汉家王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③象这一类，思想性、艺术性就都很强，而且数量还不少；可是孙洙却一概未选，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再就文人作品来说，书中所收也是不全面的。如爱国诗人张巡的《闻笛》，现实主义诗人李绅的《悯农》，聂夷中的《田家》，皮日休的《卒妻怨》、《橡媪叹》等等，也一概不选。（贾岛、姚合的五律，李贺的五、七古，统未收入，也不妥。）以上只是举例，但已显然可见孙洙把许多好诗都丢掉了，其他应选而未选的可不知有多少呢。这当然不是无意的遗漏，主要还是由于他受阶级的局限，眼光不高，不

①只收了一首歌颂叛将哥舒翰的《哥舒翰歌》，署名“西鄙人”。但这首诗是否真出民间，还值得怀疑。②③《新唐书·五行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九也收入。《唐诗三百首》卷六王维《秋夜曲》下有蓟城戍语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可见他选诗时并不是没有看到郭书所收的这些唐代民间作品。

能认识这些诗的真正好处。

书中选诗因袭别人的多，自选的少；而自选的部分又有不少问题。这是第三个缺点。据近人考证，《唐诗三百首》实以清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它与沈书完全相同的多达二百二十二首，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次序编排以及突出盛唐（特别是突出李白、杜甫）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唐诗三百首》另立乐府一体，又不选长律罢了^①。沈德潜是清初赫赫有名的诗人，他的《唐诗别裁集》初刻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早于《唐诗三百首》四十多年；增选本印行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也早于《唐诗三百首》一年^②。《唐诗别裁集》是一个很流行的选本，孙洙论诗又和沈德潜很相合^③，所以他以沈书为底本，略加增删变动，编成自己的选本，是很可能的，也是比从《全唐诗》里挑选大为省力的。书成之后，他不肯用真姓名，只署蘅塘退士，大约也就是由于因人成事，并未多费时力的缘故。又据近人考证，《唐诗三百首》选王维诗多达二十九首，仅次于杜甫，比李白还多两首，这是受王士禛的影响。选近体诗，多收中、晚唐人之作，这是受袁枚的启发。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那么《唐诗三百首》的选诗，严格说来，都是依据别人的标准，孙洙实未自出手眼。他自

^① 详见陈友琴《略谈唐诗三百首的蓝本及其它》，1958年3月2日，《光明日报》。^② 若依一本，则是同年出版。^③ 详见王忠《唐诗三百首的选诗标准》，《国文月刊》七十三期。

己增选的诗，有的思想内容很差，如上举李商隐《为有》、韩偓《已凉》、杜牧《遣怀》、《赠别》之类；有的艺术价值较低，如元稹《遣悲怀三首》的后二首之类，这些都是沈德潜所不取的。两相比较，孙书虽后出，但在某些方面反不如沈。《唐诗三百首》后来竟比《唐诗别裁集》还要流行，这大概也是孙洙所不及料的吧？

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里说：“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导乎先路也。”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选入试帖诗^①的旨趣。孙洙在《唐诗三百首题辞》中虽然没有这样说，但从书中也选了一些试帖诗、应制诗^②，以及存在着大量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话看来，他也是为了适应科举时代士子的特殊需要而编选的，正同沈书一样。孙洙是二百年前的一个封建文人和小官吏，生当清代封建统治全盛期的乾隆年间，他编这个选本为封建社会服务，是毫不足奇的。明白这一点，那么，它所以有忽视思想性，取材比较狭隘等等缺点，自然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总之，《唐诗三百首》在过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本，对唐诗的传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近年已有一些人在做重新编选唐诗的工作，应该说，这是完全必要的。

^①试帖诗，是唐以后科举考试所采用的诗，大都为五、七言的六韵或八韵的排律，以诗句或成语为题，冠以“赋得”二字。 ^②应制诗，是奉君命作的诗。

《唐诗三百首》原刻本，除有题辞外，又有注释和评点。注释只注事，比较简当，但不释义。评在诗行之旁，多指点作法，说明作意，偶尔也评论工拙。点只句圈、连圈，没有读点、密点。道光中，浙江建德人章燮（字象德，号云仙，监生），成《唐诗三百首注疏》六卷，自跋题道光甲午（公元1834年），距孙洙题辞时已经六十九年了。章注很详细，有诗人小传，事注，义疏，并明作法，引评语。其中李白诗用王琦注，杜甫诗用仇兆鳌注，也都是清代较好的注解。蕲塘本旁评仍保存，但没有连圈。书中又增补了若干首，作家则仍旧。这书体例比较杂碎，疏漏、附会等毛病也都不免，但很便于初学。有原刻本，又有翻刻本。后一种附有金坛于庆元《续唐诗三百首》（成于道光十七年，即1837年），诵习尤为方便。章书刊行后十年（即公元1800年），又有江苏上元陈婉俊（字伯英，桐城李世芬妻），成《唐诗三百首补注》八卷。这书比较简要，也只注事，不释义，间成引宋、元、明人评论。卷首也有诗人小传。有餐花阁原刻本，四藤吟社复刻本，以及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排印本^①。

《唐诗三百首》之后，又有《宋元明诗三百首》（清朱梓、冷昌言编，1853年刊），《清诗三百首》（近人钱萼孙编）之类纷纷出现，都用“三百首”做书名，可见孙洙的影响，实在是多方面的。

^①此外，还有清李焘根《注释唐诗三百首》六卷（咸丰十年，即1860年，三元堂刻本）及近人的一些注本。

九、《古文辞类纂》

《古文辞类纂》(以下简称《类纂》或姚选)是重要的古文选集之一,选辑者是清代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姚鼐。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穀,安徽桐城县人。生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卒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四库全书馆开,任纂修官。年余归,主讲梅花、钟山、紫阳、敬敷书院,前后四十年。以书斋名惜抱轩,学者称惜抱先生。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四十卷(文二十八卷,诗十二卷),笔记八卷。选辑的书,除《类纂》外,又有《五七言今体诗钞》十六卷。此外,还有《九经说》、《三传补注》、《老子庄子章义》等。事迹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碑传集》卷一百四十一。

古文辞,就是古文。“古文辞类纂”就是分类编录的古文。有人以为“纂”原作“纂”(苏管切读suǎn),是撰述的意思。《汉书》卷一百下:“太初以后,阙而

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这是书名的纂字所本。嘉庆末年，康绍镛刻本误纂为纂，后遂通用，但实失姚氏命名的原意^①。考“纂”（作管切，读zuǎn）与“撰”通，編集的意思。两字的意义分别不大，且“类纂”一名既已通行，也就不必改了。

《类纂》七十五卷，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文章，共七百篇。分十三类，即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和哀祭。书有“序目”，除了简要地说明自己学文的经历和编选的缘故之外，主要是在十三类之前各有论说，探索文体的源流，评论作家的得失。从这里，可以看出姚氏论文的宗旨。十三类中，有些又有附类，如对策是奏议的附类（时务策又是对策的附类），檄令是诏令的附类，就是如此。序目的最后部分说明学文的程序。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这一段，精辟地阐明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姚氏的文论中的重要部分。

七百篇中，作者有主名的，共六十人。其中韩

^①见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纂后序》。考康本由李兆洛校刊，李是著名学者，康又是姚氏弟子，未必会把书名弄错，《后序》之说不一定可信。

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所谓唐宋八大家共选录三百七十三篇，占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而韩愈一人多到一百三十四篇，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最为突出。其次是欧阳修，六十六篇；王安石，五十七篇；苏轼，五十一篇；其余依次为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最少，十一篇^①。八大家以后，元代一篇未选。明代选录归有光一家，三十二篇。清代选最方苞、刘大櫆二家，前者十一篇，后者十六篇。八大家以前，涉及的面虽广，但重点是《战国策》、《史记》和两汉的一些作家^②。桐城派主张学古文要由唐宋八家入手，而姚氏又主张在八家中要取法欧、曾以上窥韩愈；再由韩愈追溯先秦、两汉。这个选本相当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明初朱右论文，不矫语秦、汉，唯以唐、宋为宗。曾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③。八家的名目实始于此。嘉靖间，唐顺之成《文编》六十

①八大家之外，唐代李翱、元结，宋代晁无咎、张载四人之作也选入，但一共只有七篇（李四篇，其余各一篇），可谓微不足道。

②此外，三国二人，晋五人，宋一人。其中只潘岳有三篇，其余各一篇，为数也极寥寥。

③朱右，字伯贤，临海人，自号郟阳子。明洪武间召修元史、日历及《洪武正韵》，官至晋府右长史，有《白云稿》十卷。《明史·文苑传》附载《赵瀛传》中。《八先生文集》，《明史·艺文志》未著录，殆已佚。黎庶昌云：“茅鹿门八家之说，世皆以为定自朱右，不知吴文正（吴澄谥号）序王文公集已言之，眉山只数二苏，子由尚不与也。”（《续古文辞类纂序》）据此，则朱右之前已有七家之说。

四篇，对唐、宋作者也只取八家^①。茅坤最信服顺之，亦用其说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②，评语多采顺之及王慎中^③说，流传很广，后来的选家多受其影响。清初，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论文提倡义法^④，以《左传》、《史记》为准则，推崇唐、宋八家。他代果亲王允礼编的《古文约选》^⑤，不选六经诸子，所录的只是汉人散文及八家之作，意在为古文义法说举例示范。方苞的弟子刘大櫆^⑥，在义法

①唐顺之(公元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会试第一，官至右金都御史、代凤阳巡抚。时称荆川先生。顺之反对李梦阳、何景明摹拟秦、汉的风气，对唐、宋文则评价很高。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同被称为唐宋派。有《荆川集》十二卷。传见《明史》卷二百零五、《文编》今存。

②茅坤(公元1512—1601年)，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论文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论点，主张学习唐、宋古文。有《茅鹿门集》。事迹见《明史·文苑传》。

③王慎中(公元1509—1559年)，字道思，号南江，别号遵岩居士，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进士，官至河南参政。为文一意仿效欧、曾，与唐顺之齐名。有《遵岩集》二十五卷。事迹见《明史·文苑传》。

④方苞(公元1668—1749年)，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会试中式，官至礼部侍郎。为学宗程、朱，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以上窥《史记》，严守义法之说，袁枚称为“一代正宗”(见其所作《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桐城派古文家则推为初祖。有《望溪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补遗》二卷。传见《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六。

⑤《古文约选》，署名和硕果亲王(康熙帝第十七子)，实方苞代作。序、例中说明选文的宗旨，可与《望溪集》中论义法诸文参看。有雍正十一年初刻本，同治八年四川总督署刻本。

⑥刘大櫆(公元1698—1779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人。官黟县教谕。少游方苞之门，传其古文义法，又授弟子姚鼐，世称方、刘、姚，又称桐城三祖。有《海峰先生文集》十卷、《补遗》一卷、《海峰先生诗集》八卷。传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

说的基础上探求“行文之道”，以为神和气是文之最精处，音节是文之稍粗处，字句是文之最粗处；但神、气比较抽象，音节、字句则是具体的，故须从音节求神、气，从字句求音节^①。刘大櫟是姚鼐的业师，《类纂》的《序目》中说：“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这里所说的薑坞先生是姚範^②，而耕南先生就是刘大櫟。所说的“古文法”，就是方苞所倡导的“义法”。姚氏自述师承所自，显然可见《类纂》的选文是直接受方、刘的影响，而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朱右及唐、茅诸人。

《类纂》一书，向来推为名选本。它在付梓之前，人们就已争相传抄；刊本问世以后，更是屡经翻刻，风行一时。学者们对它的评价极高，如谢应芝说：

《类纂》自《战国策》、《离骚》以暨于方灵皋、刘才甫，其间可增损者盖鲜矣。……所以为学者之矩矱者，其意微矣^③。

朱琦说：

①见《论文偶记》，载文集卷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单行本。

②姚範（公元1702—1771年），字南青，号薑坞，桐城人。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进士，后授编修。与刘大櫟友善，论文同祖方苞，对姚鼐颇有影响。有《援鹤堂文集》六卷、《诗集》七卷、《援鹤堂笔记》五十卷等。③《与胡念勤书》，见《会稽山房文续》，此据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五19—20页转引。

文之义法与其体例，是编（按：指《类纂》）备矣①。

李元度也说：

实履之方，不外读总集、别集。先用欧公尽力于一书之法，盖莫要《古文辞类纂》②。

故前人都以《类纂》为常读之本，以为“阅此便知为文门径。”③《类纂》何以如此受人重视呢？大概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类纂》是桐城派的文论，特别是义法说的具体体现，它选录了相当数量的示范之作，为学古文指明了入手的方法和门径。

桐城派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④。作文则讲求义法。义即“言有物”，也即有内容；法即“言有序”，也即有条理、有方法⑤。但桐城

①《自记所藏古文辞类纂旧本》，《怡志堂文初编》，转引《古文词通义》卷六36—37页。 ②《古文话》，转引《古文词通义》卷首16页。 ③这里的“前人”，指钱泰吉、吴汝纶、张元思等人。参看《古文词通义》卷四24—25页、卷五19—20页。 ④姚鼐《述庵文钞序》：“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文章也，考据也。”（《惜抱轩文集》卷四）按戴震《与方希原书》也说：“古今学问之途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戴东原集》卷九，）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引震语，则作义理、文章、考核。考核即考据。姚氏的说法，疑即受戴氏的影响。 ⑤桐城派论文法始于方苞。苞集中论义法的有《又书货殖传后》、《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与孙以宁书》等。《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按《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孔颖达《正义》：“物，事也；言必有事。”又《易·艮》：“言有序。”《正义》：“言有伦序。”

派所谓义(言有物),只是要求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特别是程(颢、颐)、朱(熹)的理学。所谓法(“言有序”),也只是要求在形式上(包括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符合《四书》、《五经》、《史记》以及唐、宋古文家的文章规范,力求语言“雅洁”^①。方苞有两句有名的话:“学行继程、朱而后,文章在韩、欧之间。”^②这正是桐城派的道统观和文统观的扼要说明。

王葆心说:“桐城统绪相承,盛于姚姬传,而姚氏义法垂于所选《古文辞类纂》。故凡宗姚选者即承其学者也。”^③王先谦说:“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闳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徧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④姚氏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他自己在古文写作方面有

①方苞认为古文所使用的语言必须不同于诗赋和其他文体,要做到雅洁。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俚语,南北史中佻巧语。”(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又李绂有《古文词禁》八条,吕璩《初月楼古文绪论》有古文五忌一条,大旨略同。) ②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五,作“制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古文词通义》卷六云:“以韩、欧之文,达程、朱之理,姚选近世文多按此旨为的。”可见方氏此二语也是桐城派的共同信条。 ③《古文词通义》卷六。 ④《续古文辞类纂序》。

很高的造诣以及他的弟子代为宣扬^①之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类纂》这个选本可供学者揣摩、诵习之用。一个著名的选本往往能够转移风气，《类纂》的情况正是如此。

第二，姚氏精于鉴别，经过他的严格挑选，录入的大多是名篇，有一定的代表性。

桐城派最推重八家，然方苞《古文约选》“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取一”^②。刘大槪《精选八家文钞》，对篇什繁富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只选取了一百篇。前人也说它“进退古人之文，其绳择谨严，大似纪文达之说唐人试律”^③。他们选八家的文章都如此之严，对其他作家就更可想而知了。姚氏后起，其识力又超过两家，所以《类纂》选文尤其精严，评论家至称为“不废江河万古流之盛业”^④。现在举一些例子：

如唐文，韩愈以前，李华、元结、独孤及等都能成家；同时或略后的皇甫湜、孙樵、杜牧诸人，其造诣也

①桐城三祖中，姚鼐造诣最深，成就最大。“论者以为辞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二》）。然姚氏生前实不甚得意，入四库馆时，与倡导汉学的戴震、纪昀等人持论尤不合。归卧沧江，教授终老。身没之后，弟子梅曾亮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声名很大，交游也广。由于他的宣传，姚氏的影响遂扩大。后来又得到曾国藩的提倡，于是桐城派的古文就更风行了。可参看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东溪文后集》）及曾国藩《欧阳先生文集序》、《圣哲画像记》等文。②《古文约选序》。③④徐丰玉《重刊八家文钞序》，据《古文词通义》卷二引。文达，纪昀谥号。

都不相上下。但《类纂》独选入元结《大唐中兴颂》，借作古文运动先驱的代表；又选李翱文数篇，以存韩门一派。又如宋文，理学家的文章独取张载《西铭》，以为理、文俱美。又取晁补之《新城北山记》，以存苏门一派。元、明及清初文，即使是姚燧、虞集、王慎中、唐顺之、侯方域、魏禧、汪琬诸名家也一概不录，而独取归有光和方苞。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姚氏自出手眼，独具精鉴灼识，对作家去取均有深意，衡量是极为不苟的①。

又如就文体说，序跋类选入司马迁、欧阳修的表志叙论及刘向、曾巩的序录；杂记类选入韩、柳、欧苏、曾、王及归有光的记事状物之作，都能各取所长。书说、辞赋等类采录的名篇尤多。采摭精华，汇于一帙，充分发挥了总集的作用，对读者也是一大方便。

第三，取材有限断，对文体的分类较为简明；《序目》剖析条流，说明去取之意，对读者也有指导作用。

方苞作《古文约选》，认为《六经》、《论语》、《孟子》是古文的根源。其支流《左传》、《史记》义法最精，是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都须熟读全书，不宜采取片段。先秦诸子精深闳博，为后世文家所取法，然体制有别，不可绳以篇法。所以经、史、子都不选②。姚氏祖述方说，在《类纂·序目》中也多次说明不选群经、诸子、史传，选辑的范围是明确的。这

①可参《古文词通义》卷一、卷五。 ②参见《古文约选序》及凡例。

一点，与萧统编录《文选》颇有相同之处。

区分文体，一般认为始于曹丕《典论·论文》，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实为八类）。陆机作《文赋》，扩充为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较曹多二种，名目也有出入。及挚虞《文章流别》、任昉《文章缘起》先后问世，于是又有了专论文体的书，分类也逐渐繁多^①。《文选》有三十八类，区分已很杂碎。明代吴讷《文章辨体》有五十四类，徐师曾《文体明辨》有一百二十七类，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有一百三十二类，更是越来越烦琐^②。穷则变，变则通，姚氏大刀阔斧地加以改变，仅分十三类，执简驭繁，遂觉耳目一新。后来的古文选家大多奉为矩矱，虽有人重事更张，然亦不过小异其面目而已^③，

①挚虞书，早佚。就后人所辑佚文看来，有颂、诗、七、赋、箴铭、诔碑、哀辞、哀策、图讖、设论诸体。任昉书，隋、唐时已亡，张缜补本，未必是先梁之旧，见《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五。②吴讷，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人。《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采辑历代至明初诗文，分体编录，各为之说。内集凡五十四体，大体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外集五卷，则皆骈偶之词。大抵剽剟旧文，罕能考核源委，不为善本。贺复徵以吴讷书所收未备，因别为蒐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然去取漫无标准，又多重复、错误，不过贪多务广而已。徐师曾，字伯鲁，吴江人。《文体明辨》八十四卷，盖取吴讷书而损益之，然分合无定，无复体例可求，在同类书中为最下。③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改为十一类，其中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牋、哀祭、传志、杂记九类，与姚氏相同。赠序，姚有曾无。叙记、典志，姚无曾有。颂赞、箴铭，曾附入词赋的下编；碑志，附入传志的下编。总的说来，“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经史百家杂钞题语》）。马其昶《古文辞类纂标注序》（《抱润轩文集》卷四）也曾论及这一点，可以参看。

并未根本动摇姚氏的分类。

第四,有圈点评注,对初学有一定的启发、帮助。

评点之习始于宋人,元、明、清初此风转盛。成书很多,品价也有高下^①。姚氏《类纂》对所选古文也有圈点、评注。大概说来,圈点是每篇都有的;评注则不是经常出现的,而且即使有,数量也不多。

圈点又有不同情况。一种是在文章的标题之下,或加三个圈,如贾谊《过秦论》;或两个圈,如韩愈《原性》;或一个圈,如苏洵《易论》。一种是在文句之旁,如柳宗元《封建论》,就有许多连圈、连点。一般地说,圈点是标示文章的等第或诗句的精警的,但也不尽然。如吕璜《初月楼古文绪论》引吴德旋的话说:“《古文辞类纂》,其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又说:“有单点而文却好者。”这话也有道理。因此,吴启昌刻本就把圈点全部删去^②。

评注包括评论和注释。评有在篇末的,如《过秦论》第一篇之末云:“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阔肆。”这一种多论文章的风格。有在篇中

^①评点标抹之学始于宋人,选本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王霆震《古文集成》、谢枋得《文章轨范》之类,都有批抹标注及圈点。 ^②吴本连批抹也删去,据说,这是出于姚氏的授意。

的，如苏洵《书论》第一大段之后云：“此段说权用，而风俗之变益甚。此下说风俗之变而因用其权。此文首先提清两层，后面先应后一层，再应前一层，使其文有反复之势。”这一种多论文章的段落层次。注，有考辨文字的，如《过秦论》“叩关而攻秦”句下云：“《汉书》作仰关，《史记》作叩。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师古乃讥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有说明作文的时间的，如欧阳修《朋党论》下云：“在谏院进。”此外还有涉及其他方面的，不更列举。

马其昶说：“姚氏之书所以足重者，以其鉴别精，析类严，而品藻当也。”^① 吴启昌说：“（先生）所纂文辞，上自秦、汉，下至于今，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使夫读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砾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玑，而泥沙靡不辨。呜呼！至矣，无以加矣，纂文辞者至是而止矣。”^② 这些话都是桐城一派的评论，不无溢美，但大体上还是恰当的。

当然，《类纂》一书也有不少显著的缺点，举其荦荦大端，有以下几项：

一是“古文辞”的名目本身就有争议。

方苞、刘大櫟都沿用“古文”一名，姚鼐以为不足，又加上一个辞字，成为“古文辞”。刘师培作《古文辞辨》，认为这是不理解“辞”的本义。他说：“近世正名义，湮于古今各撰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

^①《古文辞类纂标注序》。 ^②《古文辞类纂序》，吴刻本，李刻本亦载之。

体咸目为古文辞，不知辞义训诂。《说文》辛部云：‘辞，讼也。从𠂔，𠂔犹理辜也。𠂔，理也。’又云：‘𠂔，籀文辞从司。’是辞指狱讼言……此辞字本义也。又司部云：‘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是词章、词藻诸字皆作词不作辞。古籍皆然，秦、汉以降，始误词为辞。……实则字各一义，非古代通用字也。乃习俗相沿，误词为辞。俗儒不察，遂创为古文辞之名，此则字义不明之咎也。”^①刘氏以为文与辞有分别，不当合为一词。这是祖述仪征派主将阮元的说法。阮氏还曾进一步认为古文不得称为“文”，尤不能说是“古”^②。这样一说，古文辞三字就都有问题了。但这只是一派的见解，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如包世臣等），后来章炳麟作《文学总略》也有驳议，这里不必深论^③。不过，姚氏使用古文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书中有辞赋一类，用古文辞这一名目，就把文和辞两者都包括了。然而这一点也是不妥的，详后。

二是选录的文章，取舍不能尽满人意。有人认为选得太多，如梅曾亮就用方苞《古文约选》之例，另编《古文词略》。这书实际上是《类纂》的节本^④。有人又以为选少了，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就

①《左龠集》卷八。 ②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阮氏又有

《文言说》、《书昭明太子文选后》等文，均见《揅经室三集》卷二。

③包说见《艺舟双楫》。《文学总略》，见《国故论衡（中）》。 ④《古文词略》与《古文辞类纂约选》（近人周学熙选，凡十三卷），都是姚选的简编。

指出经、史也应选入^①。又有人以为选得不尽恰当。首先是对作者的进退,如有人认为苏辙不该入选,有人认为刘大櫟更不应入选^②。其次,就篇章说,有人以为书牍类不脛人意^③,有人以为归有光的寿序录至四首,而唐襄文公(顺之)《叙广右战功》为明一代奇作,倒反排摈在外,是选择不当^④。诸如此类,在《类纂》出版以后,即有不少议论。今天看来,当然问题更多,特别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考虑,但这是时代使然,正不必苛求古人。

三是文体分类还有不少问题。

上文曾指出《类纂》对文体的分类有比较简明的好处,但这方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一,划分的标准不一。如诏令、奏议二类,本来都是书信(诏

①曾氏说:“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将可乎哉!……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姚氏又不录子家,《序目》说:“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后人对此也有异议,并指出姚氏也未能贯彻这一主张,如《过秦论》即出子书。可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章炳麟《文学总略》。

②如刘鸿翱即对选入刘大櫟不满,欲以法式善代之(见所编《十二家古文选》)。尚镛又以姚氏举方、刘继归有光,不免方隅之见(见《耐雅堂集读古文辞类纂》)。此外,意见相同或相似的尚多,不赘引。至对选入苏辙不满的,有吴晋望等。

③曾国藩说:“姚书所选书牍,有不脛吾心者。”又说:“古文惟书牍一门竟鲜佳者。”《古文辞通义》卷十七引。

④陆继辂《合肥学舍杂记》,转引《古文词通义》卷五。

是“谕下之辞”，即皇帝给臣下的书信；奏议是“陈说其君之辞”，即臣下给皇帝的书信；书说类的书也是书信（一般的书信），但却分列三类。又如碑志类（包括碑铭和墓志铭）中的墓志铭，是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传状类一般也是记述死者事迹的，哀祭类（包括哀辞和祭文）是哀吊死者的；颂赞类是歌颂别人的，箴铭类则是戒勉自己的；所有这些类，都是按人来划分的。论辨类是论说文；序跋类是书或诗、文的前言或后记，也以论说为多；传状类是记叙文；辞赋类则是抒情文；所有这些类，又是按文体来划分的。又如就用韵与否来说，辞赋、颂赞、箴铭、碑志、哀祭等类一般都是全篇有韵（或部分有韵）；其余几类，一般都是无韵的。由此可见，十三类的区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二，有些类的界限也不清楚。如传状类是记叙文，杂记类也是记叙文，而其中有时又杂有议论的成分；碑志、哀祭二类中也有记叙的成分。又如序跋类的序和赠序类的序，是名同实异；墓志铭的铭和箴铭的铭，也完全不同。又如奏议类的议有时是通篇发议论，赠序类有时是通篇说理，这些应该都是论说文。如此之类，界限就都不很清楚。其三，选录辞赋，虽然有人极为推崇，认为桐城派导源欧、曾，上溯韩昌黎，归趋是宗尚马、扬，姚氏最得此意^①，然而选家大例：骈散必

^①吴汝纶《书古文辞类纂后》：“姚选特入辞赋一门，最得韩公论文尊扬、马本意。”（《桐城吴先生文集全书》卷三）

分编，有韵与无韵必分编，旧体与新体必分编，与此相违异，就是文学观念模糊。姚氏仿《文选》以词赋为首之例，也阑入辞赋。这是食古不化，实际上行不通。即如《文选》也选了诗歌，《类纂》为什么又不援例了呢①？

四是考订多误。桐城派论文虽然标榜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但他们的文章只是炒程、朱的冷饭，并没有多少精深的义理。词章方面，也由于一味追求雅洁，清规戒律过多，显得枯燥淡薄，没有文采。考据，更非桐城所长。即如《类纂》就有很多舛误。这里姑举几个例子：（一）《序目》传状类下姚氏引刘大槩说，认为为达官名人立传是史官的职责，文士则只能为圻者、种树之流的小人物作传②。考阮孝绪《七录》有记传录，其第八是杂传部，收入二百四十一种。《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则著录更多。其中如《四海耆旧传》、《汝南先贤传》、《海岱志》之类，作者就都不是史官③。李翱有《东川节度

①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要是说古文的源是骈文，那么，赋的源是诗；选了辞赋，就也应该选诗。《文选》以后，《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等都兼收诗赋，可说也有先例可循。但这毕竟是过去选家对文章的看法还比较模糊的反映，其实不足为训。②刘说又本之方苞。苞谓：“文士不得私为达官立传，韩愈传陆贽、阳城，载《顺宗实录》，不入私集也。必厄穷隐约，国史所不列。文章家乃私录而传之”（《天岳山馆文钞》卷五引）接：此说章学诚已驳之。③《隋书·经籍志》著录《四海耆旧传》一卷，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作李氏撰。《新唐书·艺文志》作韦氏撰。）《兖州先贤传》一卷，不著撰人。（林宝《元和姓纂》作仲长殷撰。）《海岱志》二十卷，齐崔慰祖撰。

使卢坦传》，苏轼有《太常少卿赠工部侍郎陈希亮传》，其人都是达官，李、苏也都不是史官。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五说：“考《史记·平原君传》徐广注引《魏公子传》曰：‘赵惠文王弟。’则战国时已有传之名。《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自东方朔、陆续至顾况、何桢，共百一十篇，是古又有别传之体。别传者，明其别于史传也，既别于史传，何不可作之有！”这是驳得有理、有力的。又如奏议类上选了匡衡《戒妃匹劝经学疏》，但《汉书》衡本传说“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这明明分三事，而姚氏却漏了一事。又如上引的《过秦论》的“叩关”，姚氏以作叩为当，不应作仰。不知作叩、作仰都不对。段玉裁《说文注》匕部叩下云，“叩与仰义别。仰训举，叩训望。今则仰行而叩废，且多改叩为仰矣。……《过秦论》：‘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俗本作叩，作仰，皆字误声误耳。”可见姚氏所考辨也是不正确的。

《类纂》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当时姚氏正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乾、嘉间学者所见大都是传抄本，到了嘉庆末年，姚氏门人兴县康绍镛才由李兆洛的介绍从吴育处得到稿本，在广东刻版。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江宁吴启昌又刻于南京，其底本是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所授。姚氏对《类纂》随时改定，直到逝世前才停止。康、吴由于所据底本不同，所以有异同，而康本较流行，各

地翻刻亦较多。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滁州李承渊以二本各有讹脱,均未精善,又就所得姚氏后人藏本重为校刊,不但有评注,有圈点,又加句读。自为之序,并附录康、吴两序。前人对康、吴二本的优劣曾作过比较,有不同意见^①,但李本后出,实较二本为胜。特别是有了句读,就更便于初学。

姚书问世以后,续者、评者、注者纷然并起,现在撮举几种如下:

一、清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有序,有例略,又有作者姓氏爵里志略。此书选录乾隆以后至道、咸间古文家的文章,分类依照姚书,但无奏议类、诏令类、辞赋类;书说类无说,赞颂类无颂;只有这些略有不同。此书有思贤讲舍本,与姚选合刻,题为《正续古文辞类纂》。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同。

二、清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分三编:上编三卷,选经、子;中编十五卷,选史;下编十卷,选方、刘前后之文。总共四百四十九篇。自序称,选录文章,品藻次第,皆以曾氏(国藩)之说为依据;分类亦增入叙记、典志二门,为姚书所无。有《四部备要》本、李光明庄刻本。

^①朱琦、吴汝纶等均以为吴本是姚氏晚年定本,胜康本,但两本实均不如李承渊本。

三、近人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六十卷。1922年九月中华书局石印本。自序云：“集近世名家薛福成而下若干家之文，参用姚氏、王氏之例，即名曰《新古文辞类纂》，都六十卷，刊而布之。存当世之文献，资学者之观摩，庶几其有一当也。”按：此书选有王闿运、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文章，不全是桐城派。瑞藻，诸暨人。

四、王文濡《评校音注续古文辞类纂》八册，1920年上海文明书局刊。又一本题《续古文辞类纂评注》，1924年初版，评校者亦为王氏，卷首有《评校音注例略》八条。文濡，吴兴人。

五、沈伯经等《古文辞类纂评注》七十四卷，沈氏与冯涵初、郭绍虞、曹绣君评注，1915年初版，前有例言九条。

六、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记》三卷，北京排印本。

此外，尚有萧穆校本、徐树铮辑评标注本及《四部丛刊》本等。

獵古資源

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清仁宗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开全唐文馆,严可均因为身在草野,不能入馆参加编纂工作,于是发愤从这年秋天起,开始搜采唐以前的文章,前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至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终于编成十五集,共七百四十六卷。这就是有名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书名太长,前人征引时,也有的用《严氏文编》的简称。

可均(公元1762——1843年),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举人,官建德教谕。不久,引病归,专力撰述。可均学问渊博,精研文字音韵之学,对校勘、辑佚用力尤勤。生平校辑的诸经逸注及逸子书等几十种,连同他自己编写的文稿,合为《四录堂类集》,凡七十三种,一千二百五十一卷。其精力过人,可以想见。传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八,《清史列传》卷六十九。

这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上下三千多年,收入作者二千四百多人,每人都为作一小传。有些不

知朝代的，则附于全书之末，称为《先唐文》，作者五十四人。书有《总序》，说：“肆力九年，草创粗定。又肆力十八年，拾遗补缺，抽换之，整齐之，画一之。”又有《凡例》十四条，其中主要的几条是：（一）全书大例遵《全唐文》，《全唐文》不载诗，这书也不载诗。（二）书中所收的文章，分代编次；作者文章较多的，又按文体分类编次；文体共有七十类。（三）经史子三类原书现存的，不录；录其中的一部分单篇。从这些说明中，可以看出这书编写的经过及其体例的大概。

严氏在《总序》中又说：“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不才之责也。”《凡例》中也说：“一手校讎，不假众力。”这些话都非常明确地肯定这书是他独力编成的。但据俞正燮等人的记载^①，则孙星衍、孙星衡、李兆洛、吴鼐、顾广圻等也都做过编次唐以前文章的工作，有的且已成书（如李兆洛的《八代文》），有的也已草成初稿（如孙星衍）。因此，这书是否出于严氏一人之手，就成了疑案。有人甚至说他盗窃孙星衍的遗稿，据为已有^②。近人傅增湘辑录众说，详加考核，并作结论说：“余意铁桥以博学鸿才，赞翼盛业，其致力视诸人为勤；萃万编以底于成，或出其手订。然渊加（孙星衍）开创之功，申

^①见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及蒋彤《李申耆年谱》、谭献《复堂日记》卷五、杨守敬《晦明轩稿》卷下。^②这是谭献的说法，见《复堂日记》卷五。

耆(李兆洛)总揽之力，星衡助理之劳，与夫鲍氏倡导提挈之盛心，又乌可泯没，使无传于后耶？而铁桥自序乃绝无一语及之。……此所以启来者之疑，而致郭氏窃注之讥也。”^①又说：“按诸家所言，知孙、李诸公原辑，起汉、魏，迄于隋，故称‘八代全文’。严氏又补辑上古、三代、先秦，遂改题今名，其为功至伟。前古后今，相得益彰。第必自矜创作，谓前先无所因，则殊形其隘耳。”^②这似乎是比较公允的说法。但近人钱锺书在《管锥编》第三册中又提出不同的意见。钱先生的根据是：(一)王毓藻刊行此书是据严氏手稿，并在序文中断言“点窜涂乙，丹墨纷如，皆广文手笔”；(二)严氏《铁桥漫稿》卷三《上提学陈硕士同年书》、《答徐星伯同年书》，述说草创此书之勤劬，自我作故，决非因人成事；(三)同书卷四《答孙氏同》，面斥孙星衍的不学，辞气轻薄，可见严对孙很鄙视，决不致攘夺其书；(四)《全三国文》卷三十五对杨泉《物理论》，不辑只字，不按片语，一反全书通例。这是因为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已有此书辑本，故不屑享人之成；(五)严氏致徐星伯书，欲得梁永阳王前墓志及隋高丽碑，今书中已有梁墓志，是徐录寄。而此志是海内孤本，孙氏《寰宇访碑录》未收，此尤为书非孙作的切证。有此五证，

①②《藏园群书题记》卷八(傅氏自印本)。鲍氏：指鲍廷博，安徽歙县人，家富，喜刻书。倡议编纂八代文，并愿出资刊印，所以这里说他有“倡导提挈之盛心”。

于是推论：“严、孙或始欲协作，渐即隙末，而严不舍以底于大成，孙则中道废置。故严叙绝不道孙，以原有共辑之议，恐人以己为掠美也；而孙谱必道严，亦正以初议共辑而终让严氏独为，恐其书成而专美也。俞氏《识语》当是惑于悠悠之口。”^①这里提出的证据是有力的，推论也是合乎情理的。一件聚讼已久的疑案至此大概可以得到解决了。

这书编成之后，由于部头太大，严氏无力刊行。直到他死后三十六年（公元1879年）才有他的同县蒋豁父子为刻目录一百零三卷^②。又过了八年，才由上面提到的黄冈王毓藻出资次第刻印，至公元1892年全书告成。上距严氏成书之时，已经将近六十年了。王刻本共一百册，比较繁重，近年中华书局有精装本，只四册，检阅较便。

从上古到隋，各个朝代的年限有长短，作者及其存留的作品有多少，这书十五集的卷数因之也有不同。计：《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零六卷，《全三国文》七十五卷，《全晋文》一百六十七卷，《全宋文》六十四卷，《全齐文》二十六卷，《全梁文》七十四卷，

^①这里所说的“严叙”，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氏自叙；“孙谱”，指《孙渊如先生年谱》；“识语”，指俞正燮《全上古至隋文目录不全本识语》（《癸巳存稿》卷十二）。^②近今刘盼遂又有《严铁桥全上古三代秦汉文补目》（《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一期，一九三一年二月）。

《全陈文》十八卷，《全后魏文》六十卷，《全北齐文》十卷，《全后周文》二十四卷，《全隋文》三十六卷，《先唐文》一卷。最后是《韵编全文姓氏》五卷，原缺，大约是严氏想着手而未及编成。

这书有如下一些长处：一是收录十分丰富。严氏在《总序》中说：“广收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籍，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网弗综录，……唐以前文咸萃于此。”姚振宗也说：“严氏深于目录考证之学，所辑（《文编》）……虽曰总集，而兼包四部；于子部之书，所辑尤多；集部则佚文皆在，实为考据渊薮。”^①这些话都不算过分夸张。尽管严氏充分利用了前人辑录的资料，有一定的凭借，但他付出了长期的辛勤劳动，把他能够找到的统统汇集在一起，为后人研究唐以前的文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一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二是考订比较详密。姚振宗很推重严氏所作的撰人小传，以为“多有不见于史，而皆有援据，无一字无来历。”^②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征引《水经注》、《初学记》等书，说是有些佚文严氏没有辑入，姚氏也批评曾氏说：“此非严氏失采，实曾失考矣。严氏考订精密，非前后检照，未可轻议其失也。”^③平心而论，严氏长于辑佚，从上引《铁桥

①②《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师石山房丛书》本，开明书店一九三六年版）。③《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之二。

漫稿》卷三《答徐星伯(松)同年书》及卷五、卷六所载诸书序录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博涉多通，功力深厚。他编这书，在辨别真伪、考核事迹、校订文字等方面，都下了很细密的功夫，确非后人掇拾一二残剩所可轻议。陆心源《与缪筱珊太史书》极力贬低严氏^①，那是并不公允的。三是为众多的作者和文章排了一下队，理出了一个头绪。作者的时代、年辈，有些是很难排列先后的；文章的排次有时也不容易。严氏这书包括的时代过长，更是难上加难。严氏的安排，有的很好，如袁涣、应瑒、徐翰、刘楨、王修等人死于建安(汉献帝年号)年间，新、旧《唐志》都列入魏代，是不妥当的；严氏改入后汉，断限就比较清。又如诏令、书疏、奏议、碑版等文，都按年月日为先后；年月日不详的，列于各类之末，这也是处理得较好的。有的则不合理，不科学，如赋、颂、箴、铭，依唐人类书分门为先后。又，每代作者，以帝、后、宗室诸王、国初群雄、诸臣、宦官、列女、缺名、外国、释氏、仙道、鬼神为先后。这些，就属这一类。但是，不管怎样，他总算是想出种种办法排出顺序来，这对检查是有一定方便的。

①《仪顾堂集》卷四。陆文说：“严铁桥仅有校释之能，未得旁通曲证，盖第二流也。即如所辑全上古三代六朝文，以《百三家集》、梅氏《文纪》为蓝本，增益无多；而以洪饗轩《经典集林》及从《群书治要》中辑出各种附益之，余无所得。”这些话都说得未免过分，也与实际情况不大相符。

这书的缺点，上面谈长处时已经谈了一些。现在补充几点：第一，从今天看来，它仍有遗漏，同书名的“全”字还不完全相符。它所遗漏的又有几种情况：其一，道光以后出现的实物和书籍，严氏都没有看到，自然无从收入^①。其二，有些零碎材料或整段整篇文字，散见各书，严氏限于闻见，未及收录；或一时疏忽，偶而失采。这一类还有不少^②。其三，前人文章已佚而篇目尚有可考的，按照严书的体例，也附列其目，这种办法很好，但严氏遗漏的却很多^③。总括以上几项，可知严氏所辑的还不能算真正完备。近人刘师培曾说严书“略得百分之九十五”^④这个估计，倒是大致不差的。第二，收录、考订，都有一些错误。例如梁沈麟士《祖德碑》，本是伪作，严氏辑入，这是误收。后汉王粲

①实物，如甲骨、铜器、简牍、石刻等。书籍，如敦煌写本以及《玉烛宝典》、《文馆词林》残本等。②零碎材料，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孔氏卓卓，信含异气”四句，严氏辑刘桢文，即未列入。整段的，如唐贾公彦《周礼疏·序周礼废兴》引汉马融、郑玄《周官传序》各一段，共七百字，严氏未采。整篇的，如《续汉书·历志》引汉贾逵论历四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晋顾恺之论画等三篇，宋王微序画一篇，以及刘向《别录》佚文见于今本《战国策》、《晏子》等书的，严氏也未采。此外尚多。（近人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二十九也举了一些例子，并说“以此推之，所遗漏者必多”。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管锥编》也说：“櫛燕未尽，余地尚多。”）③如王粲《征思赋》，徐幹《玄猿赋》、《漏卮赋》，见于曹丕《典论》，严氏未采。此外尚多。④《左盦外集》卷十三《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荆州文学官志》“百氏备矣”句下，严氏辑本杂入《文心雕龙·宗经》文一百八十八字，这是误合。又如《谈疏》六卷，本是晋简文帝司马昱作，严氏以为梁简文帝萧纲作；《显忠录》二十卷，本是北魏清河王元怱作，严氏承《隋书·经籍志》之误，以为梁元帝萧绎作。又如《全晋文》中以张俊、张俊为二人，而不知“俊”是“俊”的讹误。又，谢琨，严氏以为爵里未详，而不知琨即谢鲲，谢衡之子，见《晋书·王廙传》。又如《全宋文》中收入孔璠（一作孔璠之）佚文，而不知《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均题晋人。如此之类，都是误考。至于《全上古三代文》中所收的一些佚文，大都从后代的书中辑出，来源复杂，可靠的程度也大有不同。其中如太昊、炎帝、颛顼以及鬼谷先生之流，其本身就是可疑的，更不要说他们的文章了。严氏在炎帝条下案语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仍把这类佚文与其他真实可信的文章等量齐观，也是不够妥当的。另外，鬼神仙侠之作，也一律滥登，就更是不能不伦不类了。第三，严氏所写的撰人小传，行文措词，从表面看，似乎只叙事迹，不加褒贬，很客观；但传统的观念仍然很重，有些地方也显然可见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一边的。例如《全汉文》卷十一《公孙述小传》就说“（述）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元年僭位”。同卷《隗嚣小传》，就说“（嚣）建武六年，勒兵拒命”。又如《全后汉文》卷一百零六收入黄巾《移书曹公》，目录上就标

为“流贼”。这些，就是具体的例子。又，书中有大量案语，从这些案语中，可见编者对旧有文献是采取贪多务博一视同仁的态度，缺少起码的分析批判。但这是旧时总集的通病，又不能独责严氏了。

上文所举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与严氏同时或略相先后的。远在严氏之前，已经有人辑录唐以前的诗文，比较著名的有：明梅鼎祚《文纪》（一称《历代文纪》）一百五十九卷^①，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梅书分皇霸（上古至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宋、南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释（历代名僧）等编，有创始之功，搜采也很广，但考订多误。张书以明张燮《七十二家集》、张采《文钞》为蓝本，参照冯惟讷《古诗纪》及梅鼎祚书，并合成编，所收自汉贾谊至隋薛道衡，凡一百零三人，每人一集，书前各有编者题辞，评述作家生平及作品得失，颇有见解，但滥收误编的也很不少。严氏以后，也有人编了一些类似的书，比较通行的有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一百八十六卷。此书收入四十家，诗文兼采，篇数尚不少，但考订不精，质量还不如严书。

^①卷数据张之洞《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鼎祚所辑《八代文纪》，卷溢三百。”然《提要》所录实只二百零三卷（不包括《三国文纪》）。

十一、《骈体文钞》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清李兆洛编。兆洛（公元1769—1841年），字申耆（一作绅琦），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由庶吉士改官安徽凤台知县。卸任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二十年。兆洛是嘉庆、道光间著名学者，又是阳湖派^①的重要作家之一，博学多通，尤精地理。著有《养一斋诗集》四卷，《养一斋文集》二十卷，《凤台县志》十二卷，《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一卷及《骈体文钞》等。传见《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一、《清史列传》卷七十三。

《骈体文钞》是骈体文的选本。骈体文，也称骈文，是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体，与散文（也称散文）相对待。“骈”的原义是“两马并驾”，引申为两两相对。骈体文一般是用平行的两句话，两两配对，直到篇末，所以叫做骈体。这种文体是中国所特有的，它的出现同古汉语的特点有一定的

^①阳湖派，是清代散文流派之一，为恽敬、张惠言等所开创。恽、张及其后继者都是阳湖人，故称。

关系，因为古汉语单音词多，用来组成两两相对的平行句是比较方便的。

李氏的这个选本是他成进士入翰林院以后开始编选的，完成于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全书选录晚周至隋的文章，分为三编：上编十八卷，包括铭刻、颂、杂赋颂、箴、谥诔哀策、诏书、策命、告祭、教令、策对、奏事、驳议、劝进、贺庆、荐达、陈谢、檄移、弹劾等十七类，共三百零九篇，“皆庙堂之制，奏进之篇”^①；中编八卷，包括书、论、序、杂颂赞箴铭、碑记、墓碑、志状、谏祭等八类，共二百一十九篇，都是“指事述意之作”；下编五卷，包括设辞、七、连珠、笈牋、杂文五类，共二百四十六篇，“多缘情托兴之作”；三编总共七百七十四篇。每编之后有小序，三编之后有总序，书前又有李氏代庄绶甲作的序^②。

此书编选的旨趣，也就是李氏论文的主要主张，在总序和庄序中说得很清楚，大意是：古人作文，本来不分骈散，两者往往是“相杂迭用”^③的。唐代以后，才有“古文”的名目，作古文的称六朝的文章为骈体，作骈体的也自以为同古文不一样，于是骈散二体就截然分开。李氏认为，从本源看，后来的骈体实出于秦、汉的散文，骈散本来是合一的，不当分

^①上编小序。以下两处引用的话，分见中编和下编小序。

^②此序见《养一斋文集》卷十八，今本未载。 ^③“相杂迭用”，原是孔丘的话，李氏取以论文，见总序。

而为二。明、清人作古文只知宗尚唐、宋。李氏认为，古文不应仅仅宗尚唐、宋，应当宗尚秦、汉；而要宗尚秦、汉，也非从骈体入手不可。李氏的这种见解，后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①。但是，不管赞同与否，大家都认为李氏这个选本很好，这一点倒是相同的。

平心而论，文章里有散句，有骈句，而且两者搀杂着使用，原是出于自然，古今中外，差不多都不例外。我国西汉以前，任何一种古书里几乎都有骈句，不过或多或少罢了。骈句逐渐增多，声律对偶也逐渐讲究，是西汉以后的事。所以《文心雕龙·丽辞》以为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以后就有了骈体文的萌芽。东汉文人，骈散互用，文体又与西汉不同。到了魏、晋，散文的“骈俪化”（或称“辞赋化”）更进了一步，骈体文就正式形成了。南北朝再加以推演，骈体文遂进入全盛时代，成为文章的正宗。隋代以后，抨击骈文的声浪渐起，至唐代韩愈，大张旗鼓，反对魏、晋以来的骈俪的文风，提倡先秦、汉代所普遍使用的散体，并称之为“古文”。此后，经过宋人的继续提倡，于是骈体文的正统地位便为古文所代替。但仍然不断有人写骈文，在某些场合，骈文也仍然继续使用，而且常有骈散之争，有时还争得

^①赞成的，可以清朱一新为代表。朱说见《无邪堂答问》卷二。反对的，可以清李慈铭为代表。李说见《越缦堂读书记》卷下《李养一先生文集》条。

很激烈。李兆洛编《骈体文钞》时，提倡古文的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①，正在开始盛行，而提倡骈体的，以阮元为代表的仪征派^②，也正用全力与桐城派相对抗。但双方的主张都有很大的片面性。李氏编选《骈体文钞》，一方面是对桐城派表示不满，一方面也是对阮元的说法提出纠正。骈散合一说，本来倡自汪中等人，但到了李氏，推阐就更为详尽了。

《骈体文钞》之所以成为有名的选本，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一）有历史的眼光，能够考辨源流。李氏认清了骈文是古文的变体，两者面貌虽不同，来源只是一个，所以这个选本就能够探溯骈体的本来面目，指出学骈文的必由途径。唐、宋以后的骈文（如四六^③之类），与汉、魏、六朝的骈文体格不同，读这个选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二）选入的文章较多，较有代表性。这一点，可以拿《文选》做比较。《文选》收录的，除诗歌外，骈文只有三百多篇，实较这书少得多。就某些方面说，这书也有胜过《文选》的地方。如“序”类，《文选》只收九篇，这书则收

①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之一。方苞所开创，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

②阮元（公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累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有《揅经室集》六十卷。阮元论文，以有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对古文颇表不满，世称仪征派。

③四六，也称四六文，是骈文的一体。全篇多以四字、六字为句，故名。

入二十四篇(内三篇与《文选》同),不但涉及的面广一些,文章也较好。(三)有些文章还加上评语。这些评语尽管很简单,但却相当精到。李氏自己本来擅长骈文,深知甘苦,所以能说出一些中肯的话,对读者很有启发。

《骈体文钞》的缺点也不少。首先,书名叫《骈体文钞》,而书中所收,如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之类,实际上都是散文而非骈文,所以当时庄绶甲就建议两篇不应收入,书名也要改。李氏不同意庄说,复信说了一大通理由^①。但既然主张骈散合一,书名却独标“骈体”究竟不大妥当。其次,李氏认为秦、汉子书都是骈体,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再向上推,则《尚书》、《周易》也未尝没有近于骈体的,为什么又不选录了呢?可见李氏的主张还不能算真正彻底。又其次,《文选》有偏重形式的缺陷,李氏这书也有同样的倾向。如汉、魏、六朝时代有不少学者长于写论文,他们的一些名篇,不但写得精微朗畅,也有进步意义。对于这种好文章,《文选》概未收入,《骈体文钞》也未能代为弥补。《抱朴子·百家篇》说:“狭见之徒,区区执一,惑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真伪颠倒,玉石混淆。”这种批评,对萧统、李兆洛这样的选家也是适用的。最后,李氏是提倡复古的,但从这个选本看,似乎

^①《答庄卿书》,《养一斋文集》卷十八。卿瑒,绶甲字。

从周到隋是骈文，而唐以后，倒是古文了，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此外，象学古文非从骈体入手不可的说法，也不尽然^①。但因与《骈体文钞》本书无关，可以存而不论了。

骈体文，一般追求形式的美，而内容往往平庸、贫乏，在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是一般逆流，它是同人民口语背道而驰的书面语言。就这一点来说，李氏编选《骈体文钞》，提倡骈体，推波助澜，也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骈体文不是没有好作品，其中确实写得好的，对唐、宋以后的文学语言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律诗）；古书中也有不少是用这种文体写的，如《文心雕龙》之类。所以，为了批判地吸收骈体文某些有用的东西，为了了解骈体文这种文体的大概情况，《骈体文钞》这个选本，就今天来说，也还不是不值一顾的。

《骈体文钞》有好几种版本，其中谭献^②的评本，评语比李氏原评较多较详，可供参考。

《骈体文钞》以外，有名的骈文选本还很不少，比较流行的有：明王志坚《四六法海》十二卷，清许桂林《六朝文絮》四卷及王先谦《骈文类纂》四十六卷等。

①李慈铭就曾反驳过这种说法，见上引《越缦堂谈书记》。

②谭献（公元1832—1901年），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同治举人，曾署歙县等县知县。擅长骈文，也喜论说，有《复堂类集》十五卷。

附 录

历代诗文总集要目述略

凡 例

一、凡本书已有专篇评介或在专篇中已连类撮述其内容的,这里只记书名、卷数、版本及作者或注者(有时也稍有补充);否则,就略举大凡,以供读者参考。

二、只收现存有代表性的,已经亡佚、残缺及无关重要的,一概不录。

三、先后排列,以作者时代或成书年代为次。

《文选》三十卷 梁萧统编。唐李善及吕延祚等五臣注各六十卷。

《玉台新咏》十卷 陈徐陵编。清纪容舒有《玉台新咏考异》十卷。近年成都古籍书店有影印吴兆宜笺注本。

《搜玉小集》一卷 不著编选人姓名,但《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书已著录《搜玉集》十卷,

今本大约是经后人删削，只存精华，故曰“小集”。所录作者凡三十七人，诗六十一首。今存唐人选唐诗，实以此书为最早。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毛晋汲古阁重刊本收入《唐人选唐诗十种》中。

《国秀集》三卷 唐芮挺章编。挺章，国子进士，里贯不详。此集选录自李嶠至祖咏九十家诗二百二十首（实只八十五家二百十八首），内有挺章自作二首。前有旧序，称编成于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近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唐人选唐诗十种》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初刻本刊行。清王士禛有《国秀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河岳英灵集》三卷 唐殷璠编。璠，丹阳（今江苏丹阳）人，进士。此集原分上下二卷，今本三卷。选录常建至阎防三十五人诗一百七十首（据自序，今本则为二十四人，诗二百二十八首），姓名之下，各有品题，大多精到。总集之有评论，自此书始。书成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璠又编次其乡人包融、储光羲等十余人之诗为《丹阳集》，已佚。后人辑得一卷，见《宗月锄先生遗著》。王士禛有《河岳英灵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篋中集》一卷 唐元结编。结（公元719—772年），字次山，号漫郎、聾叟，又号猗玗子。河南

(今洛阳市)人。天宝进士，后官道州刺史。传见《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明人辑有《次山集》十二卷。此集成于唐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录沈千运、王季友等七人五言古诗二十四首，皆淳古淡泊，不尚雕饰。字句与他本颇有异同，盖结有所点定。《唐人选唐诗十种》据《随庵丛书》影宋刻本刊行。王士禛有《篋中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中兴閒气集》二卷 唐高仲武编。仲武，自称渤海人。自序称，所录起至德(肃宗年号)初，至大历(代宗年号)末，凡二十六人，诗一百四十首。今本佚郑当一人，诗八首。作者姓名之下，各有评论，并标举警句，体例与《河岳英灵集》相同。仲武持论矜慎，鉴别亦精。《唐人选唐诗》据《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刻本刊行。王士禛有《中兴閒气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御览诗》一卷 又名《元和御览》、《唐歌诗》、《选进集》。唐令狐楚编。楚字穀士，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2年)进士，后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传见《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此集是宪宗时奉敕编的，约成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以前。选录大历至元和间三十家诗三百十首(今本二百八十九首)，皆近体；间有乐府古题，其词也都是律诗。大抵以音节谐婉为主。

《唐人选唐诗十种》据汲古阁本刊行。王士禛有《御览诗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极玄集》二卷 唐姚合编。合(约公元779—846年),字不详,陕州峡石(今河南陕县南)人。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进士,授武功主簿,后官秘书少监。世称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有《姚少监诗集》十卷。此集取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诗,共一百首(今存九十九首)。二十一人中,惟僧灵一、法振、皎然、清江不著始末,其余皆详载其爵里及登第之年。总集兼具小传,实自此始。所录多高作,合自命为“诗家射雕手”,论者以为不虚。《唐人选唐诗十种》据元至正刻本刊行。王士禛有《极玄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

《又玄集》三卷 五代前蜀韦庄编。庄(公元836—910年),字端己,长安杜陵(今西安市)人。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后仕蜀,官至宰相。传见《十国春秋》卷四十。有《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此集选录李白、杜甫等一百五十家诗三百首(今存一百四十二家二百九十七首)。因系继《极玄集》而作,故名。书在国内久佚,《唐人选唐诗十种》据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日本享和三年(公元1803年)江戸昌平坂学问所官板本刊行。王士禛有《又玄集选》一卷(《十种唐诗选》本),然士禛所见非真本。

《才调集》十卷 五代前蜀韦縠编。縠仕王建为监察御史，里贯事迹均不详。此集每卷录诗一百首，共一千首，多晚唐之作，以浓丽秀发为宗，故不收杜甫诗。清初冯舒、冯班兄弟排斥宋诗，引此书与西昆体合，推为诗家正宗，实一偏之见。此书除二冯评点本外，清吴兆宜、殷元勋均有笺注本。王士禛有《才调集选》三卷（《十种唐诗选》本），纪昀有《删正二冯评点才调集》二卷（《镜烟堂十种》本）。

《文苑英华》一千卷 宋李昉等编。此书修纂经过，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三下有记载。1966年5月，中华书局影印宋刊配明刊本，末附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十卷、清劳格《文苑英华辨证拾遗》一卷。宋高似孙有《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宋刻元修本）。

《唐文粹》一百卷 一名《文粹》，宋姚铉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徐燉刻本。清郭麐《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江苏书局刻本。王士禛有《唐文粹诗选》六卷，《十种唐诗选》本。

《西昆酬唱集》二卷 不著编辑人姓名。有杨亿（公元974—1020年）序，称卷帙为亿所分，书名亦亿所题，故或疑即出亿手。亿字大年，建州（今福建建瓯）人。淳化进士，官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传见《宋史》卷三百零五。有《武夷新集》二十

卷。此集选录亿及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的唱和诗，都是五七言近体。计上卷一百二十三首，下卷一百二十五首。诗宗唐李商隐，刻意追求词采的妍华，而内容较空虚，对北宋初期的诗风颇有影响。真宗景德年间，亿官两禁，刘、钱诸人多预修《册府元龟》在秘阁，故取玉山策府之义，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西昆体（亦简称昆体）一名即由此而来。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一名《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宋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编。或疑出宋敏求手，非。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仁宗时进士，神宗时拜相，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传见《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临川集》一百卷。安石就宋敏求家所藏唐诗，选一千二百四十六首，成此书。不选王维、李、杜、韩、柳、元、白诸大家，有些诗中的字句也与通行本颇有出入。有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宋瑩、丘迕求刻本。（此书有分人、分类二本。分类本日本已印；分人本，只南宋抚州刻本尚存九卷。）

《古文苑》二十一卷 不著编辑人姓名。宋章樵注，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韩元吉重编本，九卷。孙星衍岱南阁本，亦九卷，无注。星衍《续古文苑》二十卷（平津馆本）。

《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编。茂倩，泽州须

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南宋初为侍读学士。此集总括历代乐府歌词,上起先秦,下至五代,分十二类。每类有总序,每曲有解题,征引浩博,考订精审,后世谈乐府源流的,大都以此书为祖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本。1955年6月,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宋本增补影印,1979年11月中华书局校点印行。元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溯乐府之源;明梅鼎祚《古乐苑》五十二卷,拾郭氏之遗;二书均有可补充郭书处。

《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 宋洪迈编。迈(公元1123—1202年)字景卢,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南宋初,官至端明殿学士。传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原本一百卷,每卷百首,然实不满万首,又多误收,后佚九卷。明赵宦光、黄习远订正此书,删去误收二百十九首,增补作者一百零一人,诗六百五十九首,只四十卷,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刻本。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存诗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则删汰更多,然唐人名作已大略具备。有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芸香阁刻本。

《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祖谦(公元1137—1181年),字伯恭,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官至国史院编修,传见《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南宋初,得江钊《文海》,孝宗命祖谦校正,遂博采他书,仿《文选》例,成此书,分六十一类。

然祖谦论文反对浮华，所收录多有关政治、学术，与萧统大不相同。有明胡韶修补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清庄仲方《南宋文范》七十卷，外编四卷。选录南宋诗文，可续《文鉴》。有活字本、苏州局本。

《古文关键》二卷 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二苏（洵、轼）、张耒七家文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为初学指示门径，故谓之“关键”。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原本有标抹注释，后人刊刻时删去。有《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 宋楼昉编。昉字畅叔，号迂斋，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此书本名《迂斋古文标注》，大致仿《古文关键》，而所录上自秦、汉，篇目较多。盖昉即吕祖谦之门人，因其师说，推阐加密，尤便于学者。有《四库全书》本。

《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 宋真德秀编。德秀（公元1178—1235年）字景元，后改希元，浦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崇道学，世称西山先生。传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七。此书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自序称选文以“明义理、切实用”为主，否则辞虽工亦不录。持论甚严，然不免

迂腐，故不大流行。续集所选皆北宋文，但缺辞令、诗歌二类；议论类的末卷又有录无书，是未成之本。有《真西山全集》本（复刻三十卷，续集二十卷）。

《妙绝古今》四卷 不著编选者姓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定为汤汉所编。汉字伯纪，安仁（今湖南安仁县）人。度宗时官至工部尚书，事迹见《宋史·儒林传》。此书所录起《左传》，迄眉山苏氏，共二十一家，七十九篇。据自序，知选定于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书中间有评注，大约亦出汉原本。有《豫章丛书》本。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旧本题庐陵（今江西吉水县）王霆震亨福编，不著时代，观其刊刻格式及避讳字，大约是南宋理宗时的书肆本。此书所录自春秋至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篇，其中宋文占十分之七八。卷端题“新刊诸儒评点”，对吕祖谦、楼昉、真德秀等人的选本采录特详，圈点标识，一律照搬。书名称“前集”，大概还有后集若干卷，已佚。有《四库全书》本。

《文章轨范》七卷 旧本题宋谢枋得编。枋得（公元1226—1289年）字君直，号迭山，信州弋阳（今江西弋阳县）人，官江东制置使。宋亡，起兵被执，绝食死。传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五。此书选汉、晋、唐、宋文十五家六十九篇，其中韩愈文几占半数。前二卷题为“放胆文”，后五卷题为“小

心文”。各有圈点批注。有《谢迭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

《中州集》十卷 金元好问编。好问（公元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宣宗兴定五年（公元1222年）进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传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此集采录金源一代的诗，作者二百四十九人，因多聚于中州（今河南一带），故名。前有自序，作于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作者姓名之下，各有小传，详记事迹，兼评其诗。大旨借诗存史，故往往旁及轶事，不拘一格。所录诸诗大多格力道健，远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书后附《中州乐府》一卷。有武进董康影元刻本、《四部丛刊》影印董刻本。好问不选同时人诗，元房祺乃编《河汾诸老诗集》八卷，录麻革、张宇等八人诗一百九十八首，以补《中州集》之缺。祺，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官大同路儒学教授。有《元人选元诗五种》本。

《唐诗鼓吹》十卷 元好问编，元郝天挺注。此集所录皆唐人七言律诗，凡五百九十六首，作者九十六人。大抵以高华沈著为宗，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实在方书之上。有元京兆日新堂刻本。此书除郝注外，又有明廖文炳补注本，清吴汝纶评点本。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元方回编。回（公元1227—

1306 ?年)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今安徽歙县)人。宋末知严州,降元,为建德路总管。此书兼选唐、宋二代的诗,分四十九类。所录都是五七言近体,故曰“律髓”;自序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义,故曰“瀛奎”。回论诗,大旨排斥西昆而推崇江西派,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对后来的江西派颇有影响。有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紫阳书院刻本。纪昀评点《瀛奎律髓刊误》四十九卷,许印芳编《律髓辑要》七卷,吴汝纶编《桐城吴先生评选瀛奎律髓》四十五卷,均可供读此书时参考。

《谷音》二卷 元杜本编。本字伯原,清江(今江苏清江市)人,事迹见《元史·隐逸传》。此书辑宋末遗民三十人诗,一百零一首,每人各载小传。选诗鉴别甚精,王士禛颇加推许。有汲古阁刻本。

《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 元苏天爵编。天爵(公元1294—1352年)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官至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传见《元史》卷一百八十三。此书刊于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原名《国朝文类》。所录自元初至延祐(仁宗年号),正元文极盛之时,分四十三类。天爵妙解文章,工于鉴别,其去取又极精严,故论者以为可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

文鉴》鼎足而三。然钱选唐文多据《文苑英华》，祖谦选北宋文，多据《文海》，不过稍加附益。天爵此书无所凭借，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谓独勤。终元之世，亦无人能续其书。有《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西湖书院刻本。

《唐音》十四卷 元杨士弘编。士弘字伯让，襄城（今河南襄城县）人。工诗文，有《览池春草集》。此书成于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有虞集序。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因“遗响”有一子卷，故自序称十五卷。“始音”只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按诗体分，以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诸家之作俱在，而附以僧诗、女子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均不入选，凡例谓世多有三家全集，故不录。士弘积十年之力成此书，去取颇不苟。后来高棅作《唐诗品汇》，即因此书体例而稍变之；“排律”一名，亦沿用此书。有张震辑注本、顾麟批点本，皆明刻。

《乾坤清气集》十四卷 明偶桓编。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眇一目，又自号瞎牛。太仓（今江苏太仓县）人。明初，官荆门吏目。此集选录元一代之诗，分体编次，而亦上该宋、金之末，下涉明初，去取极为不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能别开生面，惜缺七言绝句一卷。有《四库全书》本。

《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 明高棅编。棅一

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闽中十子之一。明成祖永乐时，为翰林待诏，升典籍。事迹附见《明史·文苑·林鸿传》。此书录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体编次；各体之中，又各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九格。凡例谓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为大家，为名家，为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为余响；方外异人等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自异的，则不拘世次。初盛中晚之分，倡自宋严羽，至榛又因杨士弘《唐音》而推广之。有明一代，馆阁皆以此书为模式。有明刻本。1982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汪宗尼校订本影印出版。榛又有《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是由此书约选而成，有明嘉靖何城重刻本。

《明文衡》九十八卷 原名《皇明文衡》。明程敏政编。敏政（公元？—1499？年）字克勤，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事迹见《明史·文苑传》。此书收录成化以前之文，分三十八类。贪多务得，不免稍涉芜杂，又多阙文，不能算是善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间重刻本。

《文编》六十四卷 明唐顺之编。顺之（公元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会试第一，

官至右金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传见《明史》卷二百零五。有《荆川文集》十二卷。此编收周至宋之文，分体编纂。顺之论文以法为先，书中所标举者，皆文家枢要，盖顺之心知得失，故所言大都中肯。有《四库全书》本。

《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 亦称《诗纪》。明冯惟讷编。惟讷字汝言，临朐（今山东临朐县）人。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事迹附见《明史·冯琦传》。此书前集十卷，皆古逸诗。正集一百三十卷，则汉、魏以下至陈、隋之诗。外集四卷，附录仙、鬼诗。别集十二卷，则皆前人论诗之语。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舛牾舛漏，皆不能免。故清冯舒作《诗纪匡谬》一卷，摘出一百十二条，多中其失。然上起太古，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考诗家源流者，固不能舍此书而别求。后来臧懋循《古诗所》、张之象《古诗类苑》、梅鼎祚《八代诗乘》相继竞出，但总以此书为蓝本，不过间有补缀而已。有原刻本、吴琯重刻本。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亦据此书，并稍加增订，然考核不精，校注亦疏略。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编。坤（公元1512—1601年）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事迹见《明史·文苑

传》。有《白华楼藏稿》十一卷，《续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等。坤论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文编》只采八家，坤此书亦只收八家之文。所选繁简得中，又有评语，足以启发初学，故传习颇盛。然书中舛误不少，圈点批抹，亦多欠恰当。黄宗羲《南雷文定》中有《答张自烈书》曾列举若干条，皆切中其失。清储欣（字同人，宜兴人，康熙十七年举人）以坤书为蓝本，增李翱、孙樵，成《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各为批评，间附考注。其中标识，全依茅本之旧。欣书有苏州局重刻本。

《唐音统签》一千零二十九卷 明胡震亨编。分十集，已刊各集有缺卷缺叶，抄本均已补齐。故宫博物院所藏为足本。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坚编。志坚字弱生，更字淑士，一字闻修。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金事。事迹见《明史·文苑传》。此编选录魏、晋至元骈文，分类编纂，多取骈散相兼，不甚拘对偶者，使读者知四六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每篇之末，或笺注本事，或考证异同，或胪列始末，亦皆原原本本，语有实证，非明代其他选本可及。据其凡例，虽为举业而作，实则四六之源流正变具于此编，世称善本。有乾隆修补本、广州重刻本。清蒋士铨有删评本八卷（巾箱本）。

《文纪》一百五十八卷 一称《历代文纪》。明梅鼎祚编。鼎祚字禹金，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人。事迹见《明人小传》卷四，《明诗综》卷六十二。此编录陈、隋以前之文，以配冯惟讷《诗纪》。计《皇霸文纪》十三卷（上起上古，下迄于秦，以配《诗纪》的古逸诗）。《西汉文纪》二十四卷，《东汉文纪》三十二卷，《西晋文纪》二十卷，《宋文纪》十八卷，《南齐文纪》十卷，《梁文纪》十四卷，《陈文纪》八卷，《北齐文纪》三卷，《后周文纪》八卷，《隋文纪》八卷。上起古初，下穷八代，旁搜博采，荟萃成编，使唐以前的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实在是艺苑的大观。虽然卷卷有错漏，但搜集之功应予充分肯定。鼎祚另有《三国文纪》二十四卷，《东晋文纪》若干卷，《后魏文纪》二十卷，或有刻本，或仅有钞本，均甚罕见。又有《释文纪》四十五卷，收录历代名僧的文章以及诸家为释教作的文章，各注事实，极便检阅。《文纪》有明张煊、周维新刻本、明末刻本。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 明张溥编。溥（公元1602—1641年）字天如，太仓（今江苏太仓县）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进士，改庶吉士。曾集郡中文士，结文社名复社。自称继承东林，敢于评议时政，影响很大。传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七录斋集》十二卷，诗三卷。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诗汇于一

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文汇于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的遗集汇于一编。溥以燮书为基础，取冯、梅书中著作稍多者，排比附益，以成此编。其中间有非集而强名为集的，也有编次舛误的，然条分件系，较易检寻。每集溥均有题词，评论得失，亦多可采。有汲古阁刻本。

《列朝诗集》八十一卷 清钱谦益编。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年自号蒙叟，又号东涧遗老。常熟（今江苏常熟县）人。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降清，以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有《初学》、《有学》二集。此书仿元好问《中州集》例，选录明代诗人约二千家，目的在“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一代文献赖以保存不少。书中评论，亦多精到。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清初黄宗羲编。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明亡，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著述。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诗案》等。传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此书原有六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时，删去记晚明史事部分一百十八卷。分二十八体，每体又各分子目，采摭繁富，明代散失的文史篇章多赖以保存。体例不免芜杂，阎若璩《潜邱杂记》谓是宗

羲晚年未定之本，其子百家排纂成书。浙江图书馆有钞本。《文海》卷帙太多，披览不易，宗羲又从百家之请，选其精萃，为《明文授读》六十二卷，其序则仍《文海》之旧。有刻本。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3年），徐乾学等奉敕编。乾学（公元1631—1694年）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顾炎武甥。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有《憺园集》。传见《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一。此书所录上起《左传》，下至宋代，各有注释评点。有内府原刻本、广州重刻本。

《古文观止》十二卷 清吴乘权、吴大职编。有通行本及198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陈元龙奉敕编。元龙字广陵，海宁（今浙江海宁县）人。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传见《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此书集录先秦至明代的赋，《正集》分三十类，是叙事记物之作；《外集》分八类，是抒情的赋。另有《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收罗赋体作品，以此为最完备。有扬州诗局本、重刻通行本。

《全唐诗》九百卷 清彭定求等编，曹寅校刊。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武英殿刻本。1960年4月，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刻本校点印行，后附

日本上毛河世宁辑《全唐诗逸》三卷。1932年7月再版，又收入王重民、孙望、童养年三人所补辑者为《全唐诗外编》。附《作者索引》一册

《四朝诗》三百二十卷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张豫章等奉敕编。豫章，江南青浦（今上海市青浦）人。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进士，此书所录凡宋诗七十八卷，金诗二十五卷，元诗八十一卷，明诗一百二十卷。各以作者姓名爵里冠一代之首，网罗尚富。有扬州诗局本。

《全金诗》七十四卷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郭元钊奉敕编。元钊字子宫，江都（今江苏江都县）人。生卒年不详。以诸生与修《佩文韵府》等书，授中书。有《一鹤庵诗》。元好问《中州集》录诗一千九百八十余首，作者二百四十余人。元钊重为补缀，增作者几一倍，增诗几三倍。仍存好问所作小传，而以刘祁《归潜志》附益之，别题曰“补”。又杂取《金史》及诸家文集、说部，以备考核，别题曰“附”。元钊有所论说也附于后。金源一代之诗至此大备。有扬州诗局本。

《明诗综》一百卷 清朱彝尊编。彝尊（公元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博通经史，擅长古文、诗、词，与王士禛齐名。有《曝书亭集》八十卷。传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此书录存明代作者三千四百余人

之诗，并略述其生平及作家评论，附以自著《静志居诗话》。博而不滥，议论亦较持平，流传颇广。有原刻本、通行本。

《宋诗钞》一百六卷 清吴之振编。之振（公元1640—1717年）字孟举，石门（今浙江桐乡县）人，以贡生授中书科中书。有《黄叶村庄诗集》十卷。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此书录宋人遗集一百家，皆采掇英华，删除冗赘，各以小传冠集首，略如《中州集》之例，评论考证则加详。凡本无专集，或有集而所选不满五首者，均不收。有涵芬楼影印原刻本。曹廷栋《宋人百家诗存》二十八卷，管庭芬《宋诗钞补》不分卷，陈焯《宋元诗会》一百卷，均可补吴钞之遗。

《元诗选》一百十一卷 清顾嗣立编。嗣立（公元1669—1772年）字侠君，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进士，由庶吉士改补中书舍人。博学有才名，尤工诗，有《闻邱诗集》六十卷。事迹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此编凡三集，每集各以十干分为十集。由甲至壬收录元人专集，癸集则缀辑零散作品。自元好问以下，辑入三百家，各存原集名目；前有小传，兼评其诗。有元一代之诗，至此书而蔚为巨观。有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家刻本。《元诗选癸集》，无卷数，亦嗣立编。嘉庆时，席世臣有补刻本。

《古诗选》三十二卷 清王士禛编。士禛（公元1634—1711年）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士禛善文、词，尤工诗，有《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又合其他著述，统名《渔洋山人著述三十八种》。传见《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此书选录魏、晋至宋、元五言诗十七卷，七言歌行十五卷。有闻人傔笺，通行本。又，1980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江宁局本，无笺，与姚鼐续选五、七言今体诗十卷合刻，亦通行。

《唐贤三昧集》三卷 王士禛编。士禛论诗，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主神韵与妙悟。此书即本此旨，选盛唐作家四十三人，而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主。书名“三昧”，取佛经自在之义。有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刻本。清吴煊、胡崇笺注本，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听雨斋刻。

《唐诗别裁集》二十卷 清沈德潜编。德潜（公元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钞》、《竹啸轩诗钞》等。事迹见《国朝先正事略》卷十八。此集录唐诗一千九百余首，分体编次。选择面较广，照顾到唐代各个时期、各种风格，向推善本，较

通行。1973年9月，中华书局据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敦忠堂重订本缩印。

《古诗源》十四卷 沈德潜编。录上古至隋古诗及歌谣，共七百余首。每篇疏解大意，并附评点。有通行本及1977年中华书局重印本。

《唐诗三百首》六卷 清孙洙编。有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小石山房刻本。李盘根有《注释唐诗三百首》六卷，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三元堂刻本。于庆元有《唐诗三百首续选》一卷，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京龙文阁刻本，附《唐诗三百首注疏》后。1979年中华书局重印陈婉俊注本。

《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选定。以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蓝本，重加改订，采录各家评语，并附考证。有内府大字本、广州重刻本、苏州局本。

《唐宋诗醇》四十七卷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选定。录唐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及宋苏轼、陆游六大家诗，以李、杜为正宗，白、韩、苏、陆为羽翼。诗后附评论、考释。有内府刻本。

《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 清姚鼐编。

《全五代诗》一百卷，《补遗》一卷 清李调元编。调元（公元1734—？年）字羹堂，又字赞庵、鹤洲，号雨村，绵州（今四川绵阳县）人。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官至直隶通永道。有《童山诗集》四十二卷，《童山文集》二十卷。传见

《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此书录五代诗甚完备，然阑入唐宋作者诗亦不少。有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刻本。

《全唐文》一千卷 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编定。有扬州局本、广州局本。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清严可均编。1958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 清李兆洛编。有康绍镛刻本、合肥徐氏重刻本、成都存古书局本。

《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 原名《皇朝经世文编》，署贺长龄辑，实魏源代编。源（公元1794—1857年）字默深，邵阳（今湖南邵阳县）人。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官至高邮知州。与龚自珍齐名，称龚魏。有《古微堂内外集》十卷等。传见《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此书选录清初至中叶论政治得失之文，以供借鉴。明陈子龙有《明代经世文编》五百零八卷，此书即仿其例。清盛康又辑《经世文编续编》，亦一百二十卷。

《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 清曾国藩编。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涤生，号伯涵，湘乡（今湖南湘乡县）人。道光进士，官至礼部、兵部侍郎。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诗文集》六卷。传见《清史稿》卷四百零五。姚鼐《古文辞类纂》不选经史，国藩以

为取材太窄，因杂取经、史、百家成此书，分十一类。通行本。

《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 曾国藩编。选录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朓、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等十八人之诗，共六千五百余首。通行本。

《金文最》一百二十卷 清张金吾编。金吾字慎旃，又字月霄，昭文(今江苏常熟县)人。道光诸生，有《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事迹见《碑传集补》卷四十八。元代中叶以后，金人著作流传极少。金吾除据各家专集外，又广搜史传、地志及佛、道藏、高丽史等书，录金代骈散文以成此编(不收诗、词)，分四十二类，远较庄仲方《金文雅》完备。有广州局本。

《六朝文絮》四卷 清许梈编。梈字叔夏，号珊林，海宁(今浙江海宁县)人。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进士，官至江苏粮储道。精金石文字之学。事迹见《续碑传集》卷七十九。此书录自晋至隋骈体文七十二篇，分十八类。所选皆短篇，较为精粹。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近人黎经诰笺注本。

《古谣谚》一百卷 清杜文澜编。文澜(公元1815—1881年)字小舫，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事迹见《续碑传集》卷三十八。此书收录古籍中上古

至明代的谣谚，注明出处与有关本事；另有附录及集说，共分三部分。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排，颇便检查。通行本。

《近代诗钞》三百七十卷 近人陈衍编。衍（公元1856—1937年）字叔伊，号石遗老人，侯官（今福建闽侯县）人。光绪举人，任学部主事。有《石遗室诗文集》、《石遗室诗话》及《辽诗纪事》等。此集录咸丰初至清末诗人之作，凡三百七十家，人各为卷。每一作者下均有小传，间载诗话，资料收集颇富。

《晚晴簃诗汇》二百卷 近人徐世昌编。世昌（公元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天津人。光绪进士，北洋军阀政客。此编收清诗六千一百余家，二万七千余首，其中颇有流传较少者。有北京中国书店印本。

《辽文汇》十二卷 近人陈述编。辽亡后，文籍散乱，清末有缪荃孙《辽文存》、王仁俊《辽文萃》为之辑录；民国后又有黄任恒《辽文补录》、罗福颐《辽文续拾》更加续补。此书最后出，亦较完备。1982年中华书局刊行。

《清文汇》二百卷 原名《国朝文汇》。近人沈粹芬等编。粹芬，山阴人。此书凡五集，收清文一万余篇，作者一千三百余人。成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采录较李祖陶《国朝文录》完备。有涵芬楼排印本。

《免责声明》

1. 本电子书籍由猎古资源网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并免费提供给社会知识大众，不用于商业交易，不含任何商业信息。
2. 书籍的作者和出版社已清楚写明，请尊重作者和出版社的知识产权，勿轻易篡改。
3. 书籍的LOGO为猎古资源网的免费标志，意在提示社会大众凡印有此标志的书籍均可在猎古资源网免费获得。
4. 猎古资源网站本旨在于将书籍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让知识不再作为一种消费品，弘扬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包容与谅解！《獵古資源》

www.lieguziyuan.com

*** 本书籍免费，并不用于商业交易。**

*** 让知识不再作为一种消费品。**